

第一章 緒論

(一) 引言：

台灣一直以來都是多元文化的地區，經過荷西、鄭氏王朝、清朝、日本以至於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使得台灣呈現出多元的文化面貌。台灣的體育政策與這種多元文化有相當關係，因此本文在探討台灣體育政策與台灣棒球發展前，必須交代台灣這種多元文化的時代背景，以呈現出為何台灣體育政策與台灣棒球為何有這樣的走向，而台灣人民又是在怎樣的情形跟著這樣的方向前進。

台灣體育政策的發展與中國近代史有相當關係，中國在近代由於列強環伺，新帝國主義向中國入侵發展他們的海外市場，其實這項警訊早在乾隆朝時已經產生，就在1793年（乾隆58年）英國使者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前來中國要求中國開港通商，但是乾隆皇帝仍舊保有大中國主義，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其他國家都只能以番邦角色向中國進貢，於是要求這位前來中國的使者行跪拜禮，在雙方堅持之下，無法進行下一步溝通，但是也使英國方面瞭解中國的發展狀態。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可以看出中國方面的老態，以及西方勢力的新興與強盛，在面臨威脅之下，中國方面的官僚與知識份子莫不要求改革，否則國家將面臨滅亡的危機。於是由同治皇帝發動的自強運動（1861—1895）逐步展開，希望透過模仿西方的船堅炮利，學習西方訓練軍隊的方式訓練中國兵，達到強大中國的目的。

標。另一方面，中國一旁的蕞爾小國 - - 日本，也幾乎在同時（1853年）同樣地面臨西方勢力的壓迫，日本方面所面臨的是美國要求開港，德川幕府（1603 - 1867）在外力威脅與內部壓力之下，加上有中國方面的例子，他們不敢再無知的對抗西方勢力，只好將政權重新交還給日本天皇，史稱「大政奉還」（1867年）。加上後來的「廢藩置縣」使得日本從封建的國家轉變成一個完整，且以中央為主導的國家。自此之後日本全力施行西化，從明治天皇本身開始，在頭髮、服飾完全西化上面可以看出，但是相較於同時期中國的自強運動，僅是幾位官員（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 等）的響應，與自行辦理各式學堂或新式軍隊，最多是在直隸省發展的北洋艦隊，不像日本是全國性的運動，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有了事實的證明，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已經成為完全現代化的國家，而中國僅在學習、模仿西方的船堅炮利，自大的中國竟被心目中的蕞爾小國日本打敗，並且割地賠款（馬關條約），台灣成為這場戰爭的犧牲品。

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確定了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本土的民眾雖然努力的想對抗日本的統治，但是終將抵不過日本強大的軍力，台灣自行建立的「台灣民主國」也頓時成為泡影，台灣自此進入日本統治階段，在這同時中國方面也意識到僅學習西方船堅炮利是不夠的，於是明治維新成為光緒朝變法人士主要學習對象。台灣這時候因為進入日本統治階段，這時候的日本已經接受了西化，相對地也將這種西化之後的日本，帶有殖民色彩的方式傳入台灣，台灣最明顯受到的影響即在教育方面，而教育主要控制在政治下，教育並不是單純的存在。教育多半都是為政治服務的，中外皆然。台灣在日治時期的教育也是為了配合日本在台灣殖民政策而施行，台灣民眾僅能在

他們的「德政」下接受基本的或是職業的教育，若想再追求更高的教育必須遠渡重洋到日本本土，當然這又是少數中的少數。由於教育中除了為了殖民而訓練教育台灣民眾成為日本的工廠工具之外，另外在教育中也加入同化的想法，尤其當日本另一個殖民地朝鮮在1919年（大正8年）發動「三一運動」，¹引起日本當局關切，於是改變了對於殖民地的統治政策，開始採行同化政策的方式統治，希望透過同化政策使得殖民地能夠完全成為日本的一部份。

日治時期的台灣教育主要是新式教育，新式教育與傳統教育完全不同，課程中包含西方的科學知識。傳統教育主要是以科舉考試為主要目標，教育內容不免呆板因此許多人批評八股考試的科舉教育，就是在箝制中國知識份子思想的最大桎梏，正當西力東漸，傳統的力量是如此的不堪一擊，使知識份子不得不起而效尤西方的科學與民主，這樣的情形在日本做的最為徹底。台灣在接受新式教育中，也接觸了新式體育教育，體育教育目的單純來說是為了訓練人類適應環境的身體與能力，因此著重在大肌肉的訓練，由於這種體育教育的觀念來自十九世紀的歐洲，使得這樣的體育教育融合了當時的民族主義的思想，教育並且訓練人民成為國家的工具，在趙汝功的《體育概論》²一書中提到，比較各國的體育教育的目的，如1.瑞典的體育目的：輔導教育，醫療民眾，培養軍事基礎。2.義大利的體育目的：A.訓練國民武力，準備戰爭；B.培養國防精神，崇敬領袖，國家至上；C.養成國民健康體格，注重兒童身心發展；D.完成教育功能，注重集團活動。

¹ 「三一運動」為朝鮮為了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所以在是年他們的皇帝仁宗過世出殯的時機，對日本在韓當局進行武力抗爭，最後雖然被平定，但是也受到日本大正天皇（1912-1926）與日本內閣的重視，決定對殖民地採取同化政策。簡江作，日本侵略韓國的歷程及其殖民統治，《歷史月刊》159期，2000年9月，頁34-44。

3.法國的體育目的：A.陶冶意志，培養集體團結心；B.鍛鍊體格，增進國民健康；C.充實國防力量，增進軍事技術，全國皆兵。4.德國的體育目的：A.培養健全國民，愛護國家民族；B.增進民族健康，注重心身發展；C.輔助軍事力量，適應國家環境之需要。5.日本體育的目的：A.堅定意志，發揚大和民族精神，統一信念，為國家為天皇犧牲一切，訓練勇敢愛國志士；B.寓軍事於體育，培養軍事知識及技術。這些歐洲地區的國家體育教育的目的，就如前面所提以服務國家為目的，日本因為受到歐洲思潮的影響，因此也強調這種為國家民族服務的體育教育，這樣的觀念也影響了在他們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另外也影響了近代中國的體育教育思想。

對於台灣民眾而言這樣的新式體育，在他們受到鄭氏王朝與清朝二百多年的統治下，已經習於科舉教育的社會變遷管道，對於這種看起來像是遊戲的體育內容（事實上依年齡分有從類似遊戲的唱遊開始到後來的大肌肉運動的分別），認為是不符合一般讀書人應有的表徵，所以在這時候台灣人對於這種體育教育開始是無法接受的，中國傳統與體育教育接近的，是武術方面的訓練，在樊正治的《中國體育思想導論》³中提到，中國的體育觀念其實多半是以養生為主要目的，結合儒家、道家與佛教的想法，沒有一定的規則與使用的目的，且在科舉制度的影響下，人人莫不以讀書為第一要途，體育觀念當然不受到重視，⁴這樣的發展和西方所強調的體育觀念，從適應環境的訓練活動，演變為遊戲的模式，最後在近代才成為為國家服務的體育觀念相當不同。

² 趙汝功，《體育概論》，台北，正中書局，1953年，頁6-10。

³ 樊正治，《中國體育思想導論》，台北，教育部體育司，1978年。

中國的近代體育思想的啟發與轉變，其實直到清末才真正受到西方影響，因為中國的孱弱，加上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後帝國主義勢力的囂張，與他們侵略未進入工業化國家的有效性，引發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西方知識的傾羨，從表面上觀察比較中國與西方的情形，認為只有接受西方體育教育觀念，才能徹底改變以往因為過度重視科學教育，所呈現出中國人體質普遍不良的弊病。為了改變這種狀態，從自強運動開始以學習西方的新式武力為出發點，進而學習西方操練士兵的軍事體操，以達強身健體之效，接著在新式教育中為了訓練學生的身體，更將這種教育觀念加入新式教育之中，之後成為蔡元培等人提倡軍國主義思想的體育教育，後來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美國學者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對於中國的教育有著重大的影響那就是自然主義、平等主義觀念的引進，影響了中國教育方面的思想轉變，其中體育教育也融入其中，但由於師資不足，及觀念的不正確等等的影響，使得中國方面的體育教育執行者變得無所適從，而採取所謂的放任式的教學，也就是什麼都不教，讓學生自由活動。後來在1920年代中國方面出現了土洋體育教育之爭，中西體育觀念與體育教學內容成為論爭的要點，最後是兩者都有存在的必要性並且相互融合在一起。隨著國民政府的成立（1928年），同時期中國也面臨內憂外患的問題，除了內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問題之外，最重要是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對中國展開積極入侵的外患日本，因為這外來勢力的威脅，改變了國民政府對於體育教育觀念的轉變，同時確立了軍事導向的政策取代了自然主義的教學觀念，這樣的情形一直到了抗戰之後，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的體育政策的導向都是受到這

⁴ 同上註，頁29-56。

段從清末到民初的影響。

乙未（1895年）割台之後，台灣民眾接受了日本的統治，也相對的在日本的漸進同化下，接受了日本的教育，其中也包含了新式的體育教育。當時流行於日本本土的是軍國主義式的體育，台灣民眾對於這種教育是非常陌生且無法接受的，主要是受到傳統中國對於體育活動觀念的影響，因為體育活動在傳統中，原是祭祀活動的一部份，逐漸的因為朝代與觀念的轉變，而成為軍事與遊戲相結合的情形，就如前面所提，傳統的觀念中認為體育活動是無濟於民生經濟，更無助於一個人的功名求取，就如同在三字經中提到的「勤有功，戲無益」，顯現在台灣也是重視文教而忽略武教，使得台灣民眾在日治初期，對於新式體育是不能接受的，但在日本政府的教育之下，觀念上也逐漸轉變，能夠接受一些新式的運動項目，其中棒球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轉變背景中傳入台灣。

棒球這項運動，根據 *New Standard Encyclopedia* 中記載，⁵這項運動是從英國的 cricket（板球）及 rounders（類似棒球的運動）中棒子和球的運動，早在1700年代，就有各式各樣原型的棒球運動，流行於美國社會中。1830年代，有這兩種說法被認定是現在棒球的雛形，一種在新英格蘭地區流行的，規模大於 rounders 稱之為 town ball；另一種是在紐約地區，類似於 cricket，稱之為「紐約的遊戲」（New York game），而「baseball」一詞來自於原先使用於英國遊戲中的木柱，改以石板與沙包在這項遊戲中而來的，至於使用菱形的比賽場地，則是在1845年，Alexander J. Cartwright他所成立的名叫「Knickerbocker」

⁵ *New Standard Encyclopedia*, Chicago: Standard Educational Corp., 1993, p.120.

棒球俱樂部所採用而來的。至於關於1907年與1930年代成立的棒球研究小組，所提到美國棒球起源是在1839年，由在紐約州庫柏鎮(Coopers Town) 的Abner Doubleday所發明的說法，*New Standard Encyclopedia* 認為不足採信。

另外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International Edition* 指出，⁶棒球這項運動有種傳說就是在紐約庫柏鎮的Abner Doubleday於1839年所發明，而書中也說這樣的說法不受到信任，因為在這故事中所提到的「棒球」一詞，在1744年的一本兒童讀物 *Little Pretty Pocket-Book* 早就出現過了，而類似於Doubleday先生發明的棒球遊戲描述的書，有在1829年出版於倫敦，由William Clarke所寫的 *The Boy's Own Book* 及1834年出版於波士頓，由Robin Carver所寫的 *The Book of Sport* 中已經出現過，因此這個說法有臆度的空間。經過二十世紀初期的爭論棒球的起源問題，一位Henry Chadwick先生指出美國棒球起源於英國的rounders，一種板球的分支，這個說法現在為一般人所能接受，如今棒球成為在美國發展流行超過一世紀久的一項運動，因此棒球這項運動的原型是英國板球與一種叫做 rounder 的遊戲結合而成，加上規則的一再演變，如一開始防守者接球是用空手接球，那是因為球的構造是如板球一般，較棒球為小且柔軟的球，而後來球做了改進，防守者也有了手套出現，再加上場地的規劃與規則的制訂 等，才一步步有了現在看到的棒球運動。

1873年（明治6年）棒球隨著基督教傳教士的傳教進入日本，在功力靖雄的《明治野球史》中提到四個棒球的傳入途徑，1.經由原先

⁶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 New York: Americana Corp., 1998, p.298.

在日本的外國教師與後來的傳教士介紹而來；2.在橫濱地區的外國人介紹；3.透過美國船員來到東方時在寄駐港口傳授4.到過美國學習過棒球的日本人回國後介紹及教授。⁷而在外國教師在學校中教授之後，或是留學之後的學生畢業之後將這項運動傳入日本社會之中，如在1877年（明治10年）由平岡熙所成立的「新橋俱樂部」來推廣這項運動。功力先生將日本明治時代的棒球分為三期，第一期為野球渾沌期（明治6年 明治20年）；第二期為一高時代（明治21年 明治37年）；第三期為早慶時代（明治38年以降），⁸藉以介紹日本從棒球傳入到後來棒球在社會及學校中發展的情形，而從他們學習棒球的態度看出，如同明治維新的想法一般，所有的制度甚至術語都完全的模仿美國的規定，並且在規則上隨著美國的改進也跟隨著改進，直到明治27年第一高等中學校（就是前面提到一高時代的一高）在《第一高等學校野球部史》中提到由他們創立野球部的二壘手中馬庚將棒球從「baseball」翻譯成「野球」，另外也將其他守備位置由英文名稱翻譯成漢字，如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投手、捕手、一壘、二壘、三壘、左翼（左外野）、右翼（右外野）、安全球（安全上壘）、三振（三振出局）、死球（四壞球保送）等等名稱，⁹而真正影響到台灣的時間是在1895年（明治28年）之後，日本統治台灣，跟著在來台灣工作的日人將棒球運動傳進台灣（時間約在明治30~31年間，1897年 1898年間），經過約一世紀的演進，棒球成為台灣受歡迎的運動項目之一。

跟隨著戰後國民政府的統治，棒球運動並未消失，且一直持續的發展，本文最主要的目的在探討，自戰後（1945年）到2001年世界盃

⁷ 功力靖雄，《明治野球史》，東京，逍遙書院，1969年，頁40。

⁸ 同上註，頁40。

成人棒球賽在台灣舉行，陳水扁總統對民眾以宣示的口吻宣稱，「2001年是台灣的棒球年」、「棒球可說是台灣的國球」，說明棒球似乎受到政府相對的重視，且發展到可以稱之為「國球」，事實上綜觀整個台灣體育的發展，棒球到目前為止的發展情形，真的能稱之為台灣的國球嗎？因此本文將從台灣在戰後的體育政策，與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間的關係作一探討，以瞭解體育政策的制訂與施行對於台灣棒球發展有何影響，而這種情形到了現在又是有何轉變的趨向，目的在釐清台灣體育教育的政策制訂，對整體的體育發展有何影響，並試以棒球運動的轉變加以佐證。

（二）研究回顧：

關於體育政策方面的研究有曾瑞成的《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這一篇博士論文將台灣自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的體育政策，作一完整的分析，將台灣的體育政策導向分為三個，分別為軍事化、競技化、教育化三個面向，以及這些面向的教育內容如何在學校的體育課程中呈現，這一篇文章單純就體育政策的內容加以分析，對於實際面的影響未加以深入探討。這一篇文章最大的貢獻在於整理出國民政府遷台到現階段的體育政策及其方向，並將相關的體育文獻作一整理分析，實為其最大貢獻，對於本文也諸多借鏡，在體育政策上的觀念多來自於這篇文章。關於台灣棒球主題的研究文章其實不少，分有幾個面向，首先為體育史方面的研究，為蔡宗信的《日據時代臺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以1895（明治28）年至1926（大正15）年》，的研究內容針對棒球如何在日治時期傳入台灣，並經由日本人

⁹ 同上註，頁80。

社會中開始流行，新式學生球隊的成立（以日本人為主），後來社會球隊在學校球隊被禁止後紛紛成立，但是後來日本治台觀念改變之後，台灣人透過新式教育接觸這種新式的體育活動，並跟隨著日本在1915年（大正4年）開打的「甲子園」高校棒球聯賽所引發的學生棒球風潮，使得棒球在台灣奠基，最後更介紹台灣的驚嘆號之一的「能高棒球隊」的事蹟。這篇文章的貢獻是整理出當時後日、台之間由於殖民與被殖民產生的差異性，認為棒球這項運動非日本人不會玩，沒想到後來「能高棒球隊」全由台灣原住民組成，卻又認為是他們日本人統治有方的效果，充分顯現出當時社會的實況，是這篇文章的貢獻，另外文章中夾有許多老照片與當時球場的介紹，對於台灣棒球歷史提供不少日治時期的珍貴資料，而文中對於日治時期的棒球觀念，也提供筆者一個參考面向。

另一方面是社會學的研究，主要是梁淑玲所著的《社會發展、權力與運動文化的形構 - 台灣棒球的社會、歷史、文化分析(1895-1990)》這一篇文章透過對台灣棒球歷史的從新建構，並將之分為日治時期（1895-1945）、政治轉移與穩定時期（1945-1968）、國民黨國族主義意識型態的滲透期與鬆動期（1968-1980s）、職業棒球成立（1900-），希望透過歷史重建，來探討在台灣內部棒球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無何形構，結論是棒球從日治時期傳入台灣之後，經過日治時期的發展後，即使到了光復後國民黨政府刻意去日本化，將棒球視為日本人的運動加以壓制，而推行在大陸較為流行的籃球，民眾對於棒球的熱情不因此而減緩，在民國57年紅葉少棒之後，棒球成為在當時國際情勢不佳下，政府最好的外交工具，強調國家機器滲透入棒球之中，直到民國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因為經濟成長，人們轉移注意力到「金錢遊戲」

(所指的是對於股票、房地產 等等的投資活動)中，對於棒球世界錦標冠軍不再重視，加上國內環境不佳，許多選手紛紛前往國外發展，直到職棒成立才又重新將棒球帶入人們的生活之中，棒球也在職棒成立之後產生出商業化的情形，而這種棒球文化卻早已形構在台灣人民生活中。此篇文章對於台灣棒球發展的分期方式雖然十分漂亮，但是一方面強調棒球其實一直在台灣人民生活中存在著，既使在國民黨政府在一開始並不贊同此項運動，後來因為少棒的好表現，使得國家力量開始介入這項運動當中，作者在這裡過分強調國家力量的偉大，與棒球本來即存在在人民生活中，自然成形的文化的說法，政府力量不是那麼重要的說法，相較之下似乎有些矛盾，而在最後結論上，作者將原先想探討的權力與運動文化的形構上著墨，硬是將台灣棒球發展套入作者想解讀的理論中，想要藉此解釋權力、社會、運動三者的相互關係，看來十分突兀，這是這篇文章的缺點。

再來有幾篇論文是針對於台灣職棒而來，主因是在1996年(職棒7年)發生了職棒簽賭案件，使得職棒產生一陣蕭條的景象，因此有許多文章對於台灣職棒經營方式如何改進，以及合約問題如何學習職業棒球成立已久的美國、日本借鏡，希望建立更好的環境提供給台灣棒球發展正確的路徑，相關文章如高興桂 我國職棒球隊企業經營困境因素與解決策略之研究、林瑞泰 美國日本台灣職業棒球契約規範之研究、吳曉雯 影響職棒球迷選擇支持球隊的因素及其與忠誠度、滿意度的關係 等等文章。另外一類文章屬於體育專門的，主要是教練研究所關於棒球技術層面探討的文章，如高英傑 棒球、楊賢銘 棒球、葉志仙 棒球運動防守技術與戰術、楊清瓏 棒球〔攻擊〕 等等文章，這些作者主要曾為棒球選手，在進入運動教練

研究所中再將他們實際經驗加以文字化，屬於棒球技術面。

期刊方面，有關於棒球起源的文章，如游至樞 棒球運動簡史、曾慶裕 棒球運動的起源與簡略歷史，說明棒球運動如何而來，而在美國發展之後，棒球的規則如何演進的過程，如壘包間的距離、內野場地的形狀、投手與打擊者間的距離 等等設計的目的為何，以及棒球運動為何在美國流行。再來為蔡宗信 日據時期台灣東部原住民棒球運動之發展 介紹日據時期，台灣東部能高棒球隊的興起與他們對於台灣東部棒球隊的影響，及後來參加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的原住民選手的表現情形，目的在鼓勵推展原住民選手參棒球運動。另外高正源 原住民與台灣棒運（上）（下） 也是在說明原住民在身體上，相較於非原住民來說，似乎有著過人的體力與速度，使得他們在棒球場上的發揮較好且較久，因此使得他們在台灣棒球發展上，佔有一定的地位。傅維寧 一百年前的中國少年棒球隊 一文介紹1872年（同治11年）開始前往美國留學的留學生，在美國當地參與棒球運動的大略事蹟，當時的留學生棒球隊中，後來也成為中國近代史中有名的人物，如詹天佑，但是這篇文章並不能解釋，台灣與中國方面的棒球發展，有任何的關連性（事實上，一點關連也沒有）。至於在與金龍少棒隊相關的文章，有黃玉? 將棒球史實塞悠悠之口 藉著金龍少棒，說明我國棒球發展早在日本統治時候已經傳入台灣，且在台灣受歡迎已久，學生球隊間的比賽也形之有年，棒球技術也有一定的水準，因此參加國外的比賽能夠獲得冠軍絕非僥倖；另外兩篇仲肇湘 中華少年棒球隊與我國體育運動、王復旦 從金龍少年棒球隊成功說起：談中國全民運動的治本之道，兩篇文章希望透過金龍少棒的表現，推動全民運動，以達振興民族之效。

譚瀛州 我國基礎棒球運動的檢討 ，這篇文章針對於1968年紅葉少棒隊帶起國內棒球風潮開始，國內基礎棒球（即三級棒球）因為國人對於冠軍意義國度重視之下，衍生出許多問題，如1.南北對峙局面造成發展不均，指的是北華興、南美和的對抗，導致好手集中在這兩支球隊，球員大牌心理作崇情形嚴重，2.超量訓練，使得球員高峰提早出現，3.不定期漫長比賽，妨礙球隊訓練，學生生活出現問題，4.球員輔導與救濟，針對球員若是無法成為國家代表隊，或是無法繼續從事棒球運動（原因是受傷、就業考量），從事其他行業或是升學如何與其他一班學生競爭的問題，希望教育單位多加重視，作者希望這種偏? 狀態能夠改善，莫因國人的虛榮心，導致青少年不必要的犧牲。

詹德基 我國棒球運動的發微與展望 ，這一篇文章說明我國棒球從少棒、青少棒、青棒以至於成棒的發展狀況，以及國際賽事上的表現，並在最後說明目前（指民國74年）國內棒球好手外流的情形，希望各界及政府多多支持國內棒球的發展。

郭成 發展自己的職業棒球隊 與楊武勳 人才外流？人才外銷？ - - 從棒球好手紛紛赴日談發展棒運 兩篇文章分別提到國內棒球發展之後，因為沒有繼續可以使球員安身立命之所，使得國內好手只好出國發展，於是呼籲首先將國內三級棒球的發展朝向正常化，不要出現好手集中於名校的不均衡狀態，之後成立國內自己的職業棒球，不僅能留住國內好手，更能使球員友好的生存環境。以上的期刊文章，不論是針對原住民對於台灣棒球的貢獻，或是針對整個棒球環境甚至是體育環境作一個探討，無不希望國內的棒球發展能夠受到重視，並且朝向正常化發展，而非只是國家、國民一時虛榮心的工具而已。

(三) 研究動機與章節說明

從研究回顧，筆者已逐漸看到台灣棒球發展的跡象，而想要更進一步的從這些脈絡中尋找一個更加清晰的說法，以理解棒球運動在與國家體育政策結合之下，有了怎樣的改變，導致台灣棒球運動在現在有機會被稱為「國球」的運動項目，因此必須加以重新釐清兩者之間的關係，以解決筆者心中的疑惑，那就是棒球是否能稱為台灣的「國球」，亦或是政治語言的運用。因此這篇文章大略能將台灣地區在戰後體育發展的狀態作一個說明，並且以台灣棒球發展做一個強有力的例證，來呈現出台灣體育發展的問題與限度，透過政策的實際施行來呈現台灣體育文化，棒球是一項重要的運動項目，他結合了不僅是體育政策，也結合整體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態，因此透過台灣地區體育政策與台灣棒球發展相互結合，探討出台灣體育的問題。這樣的寫法恐怕無法呈現完整的社會發展現象，但是筆者想利用棒球發展作一代表，呈現體育政策施行的實際面，這是這篇文章的限制，若是能將台灣其他運動項目表現出來，想必可以將台灣從戰後至現代的體育發展史做一個完整的呈現。以下是章節安排。

除去前言與結語之外，本文將分為四個章節來探討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第二章探討日治時期台灣民眾在接受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對體育觀念產生了變化，理解體育對於人身體發展的重要性之外，並開始接受新式體育教育給予的體育觀念，並且開始懂得欣賞體育活動，另外日本人對於台灣人的統治態度，在大正時期（1912-1926）有了改變，台灣民眾才慢慢接受並參與體育活動，但是棒球運動從傳入台灣都是以日本人為主要參與者，台灣人僅有少數的參與，因為如果在球

場上打敗日本人，會讓人擔心冠上「抗日」的名號，所以為了減少麻煩，以及對於棒球運動僅存留在「這是一項遊戲」，對於當時主要為農業社會的台灣家庭而言，是一種不事生產的活動，當然參與的人也就相對減少，但是在日治時期仍有兩支球隊，帶給台灣棒球史上不少驚奇，一支是在1924年由原住民（當時日本稱原住民為高砂族）所成立的「能高團」，以及另一支由漢人、原住民、日本人組成的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本文將加以介紹。第三章近代中國體育思想與體育政策的制訂，說明近代中國在遭受列強侵略的情形下，如何進行改革，不論是一開始的自強運動（1861—1895），到後來的戊戌變法，庚子後的新政（光緒28年，1902年），甚至影響到民國肇造後的政策制訂，都是配合著往國家富強的目標前進，而體育項目正是這種情形下必須建立的新觀念，由改革初期的軍國民體育思想，建立全民皆兵的觀念，配合著同時期的基督教青年會推展的體育活動，以及民國初年由美國引進的自然主義、平等主義的體育思潮，在在影響中國體育發展，甚至引發體育的「土洋爭論」，直到日本再度大舉入侵，為了維持民族生存，軍國民體育政策又成為主導，並一直影響1949年遷台後國民政府在台的體育政策。

第四章為戰後台灣地區體育政策與棒球發展，主要說明戰後台灣在國民政府主政之下，對於體育政策有何改變，並且探討棒球運動如何與體育政策互相接軌，期利用棒球運動的發展印證體育政策的落實問題，以及體育政策的走向如何影響台灣整個體育環境，棒球運動在1990年成立職業化後，拓展了棒球運動的廣度，並且隨著職業運動的推展，更加強業餘棒球的深化基礎，對於台灣整體體育而言，棒球運動可說是發展較為完善者，但是隨著棒球運動的職業化，衍生出另一

面向的問題，那就是商業化的行為充斥在棒球運動中，球員成為球團的商品，商業行為接踵而至，也導致球員對於本身行為的無法自制而造成簽賭案件的發生，造成嚴重的骨牌效應，球迷、球員紛紛出走，直到2001年因為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主辦多項國際賽事，才重新帶起台灣棒球另一高潮。而第五章體育與棒球發展的思考，最主要針對台灣整體的體育發展朝向工具化使用進行批判，並對於台灣棒球發展在不同時期的轉變做一說明，最後論述原住民與台灣棒球發展的關係作一說明。以上是本文章節的大略。

第二章 日治時期體育觀念的建立與棒球的傳入

1853年（嘉永6年），美國培理率艦叩關，結束了德川幕府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1623年—1853年），從這時候開始，日本也開始進入現代化，先是在幕府本身由一位叫做高島秋帆（1789年—1866年）的人，對於幕府諸藩進行西洋訓練方式，在1855年（安政2年）實施法國式的基本體操訓練，這套操練兵士的體操成為日本接受西洋體育觀念的契機。之後明治維新時期，有鑑於日本人人種原先就劣於西方人種，所以只好往體力與體格上改良做起，其中，軍隊的現代化是明治政府最關心的，因此在軍隊的訓練上，給予士兵相關的訓練，如體操、射擊、騎馬、西洋劍術等等，希望透過體力的訓練以及體格的改良（甚至人種改良），才能配合西方的戰術與武器的使用，因此這時候的體育是從軍事運用展開；1872年（明治5年）近代教育制度建立施行，學校中也施行體育教育但未受到重視，1873年（明治6年）當時文部省（教育部）學監D Murray（1830—1905年）提出體育（Physical education）是身體的教育，結合德、智、體三育的觀念形成的身體教育，但之後日本本土的教員有人提出，體育是透過運動與衛生養成來達到身體健康為目的的教育，在1878年（明治11年）體操傳習所成立，這時候在日本施行一種稱之為「輕體操」的體操教學，以別於軍事體操而施行於學校當中。1885年（明治17年）體操傳習所的主任教員坪井玄道著作一本名為《戶外遊戲法一名戶外運動法》的書籍，提倡體育教育除了輕體操之外，應與戶外運動結合相互運用，將體育從身體教育轉變為運動教育的觀念形成。1886年（明治19年）在學校教育另的規定下設立了體操科，體操科結合了兵式體操、普通體操與遊戲。

1890年（明治23年）10月「教育敕語」公布，目的在建立以天皇為全國效忠中心的思想教育，其中一句「一旦緩急？？？義勇公？奉？」（一旦危及國家的事情發生，必須表現出對於國家盡忠的勇氣）說明了體育的重視是為了富強主義的目的，以達到全民尚武精神的體育訓練，¹⁰而這種表現與日本本土的傳統武士道精神¹¹相互結合，成為日本新式的體育精神，也隨著日本的加速近代化，而產生了進出中國的野心。

1894年終於在日本刻意安排下，因朝鮮問題與清廷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因為種種因素戰敗（如戰艦靈活性不如日本、政策指揮不當、讓日本取得攻擊先機 等等的原因），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中國面臨戰敗之後的相同程序 - 割地賠款，台灣成為馬關條約下的犧牲者之一，此時台灣方面對於祖國產生出多怨言，發出「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¹²的怒吼，接著由丘逢甲先生發起，巡撫唐景崧擔任總統，成立了「台灣民主國」以對抗日本統治。在傾全力對抗之下，就是連中法戰爭時，在越南地區有驚人表現的劉永福黑旗軍也無法抗拒日本的武力壓迫，最後台灣地區人民只好屈服，「台灣民主國」在無法完成回歸祖國的心願前，已成為泡影。

雖然在這之後仍有零星的武裝抗日，但抗日模式也逐漸從武力轉向政治方面的和平抗爭與權利追求，並且獲得一定的成效，如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等，顯現出台灣人能夠也被允許與日方和平溝通，在殖民

¹⁰ 水野忠文，《體育史概說 - 西洋 日本》，東京，杏林書院，1992年，頁240-256。

¹¹ 結合忠貞、榮譽、德行要求...等等許多的正面成分，這不僅影響日本的近代化，更深入今日的日本人民生活中。新渡戶稻造著，吳容宸譯，《武士道 - 影響日本最深的力量》，台北，先覺出版社，2003年，頁73-95。

統治的政府下實屬難得，其實也是日方在同化台灣人成為其一部份的前提下，所衍生出利益輸送的條件，但整體而言，日本對於台灣的統治仍舊是殖民式的統治方針與策略，並且直接或間接影響對於台灣的教育。

台灣在日治時期的教育主要以殖民策略加上同化政策為導向，發展出來的就是對台灣民眾進行基礎及職業導向的教育，並讓台灣民眾的受教機會範疇受到一定的限制，台灣人民若要求得更高等的教育，必須前往日本本土求學這樣不需強制的限制，台灣民眾求學自然也因經濟方面的不許可，而扼殺許多學子的求學路途，因此簡單的說，台灣民眾仍以在台灣就讀為大多數，但是受教的內容也隨著教育年級的提升，產生出台日人之間明顯的差距。另外台灣在一開始被迫接受日本統治時，日本方面並未立即的將台灣傳統的私塾教育給停止，目的當然是想透過這樣的「德政」攏絡當時接受傳統中國科舉教育的知識份子，之後在逐一將這些私塾以新學校代替，台灣民眾由於原先抱著可以科舉制度進行社會階級改變的方式，因為日本統治施行新式教育而逐漸消失，台灣民眾也只好接受這個基本教育或是職業導向的教育作為獲取工作的途徑之一，而能夠就讀的學生在台灣民眾的總人口數上看來，仍舊是少數，但這樣的情形也隨著日本對於台灣統治時間延長而增加，加上日治後期皇民化運動的推展，日本在1941年公佈「台灣教育令」，打算推行義務教育，以達到完整的統治，真正將台灣成為他們「內地延長」的一部分，但是在1945年戰敗之後，一切的努力都消失了。

¹² 丘逢甲，離台詩，〈丘逢甲遺作〉，台北，世界丘氏文獻社，1998年，頁445-446。

接下來將針對日治時期的教育內容做一個探討，並對於日治教育新式體育教育觀念建立，以及日治台灣棒球發展做一個介紹，以了解台灣為何從零到有的接受棒球這項運動，並在台灣逐漸紮根，以致於後來棒球運動漸漸地成為台灣目前受歡迎的運動項目之一。

第一節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觀念的建立與發展

台灣在未接受日本統治之前，接受的是清朝的統治，因此在清朝統治下，台灣人若想求得功名，必須接受清朝的八股科舉教育（雖然也有武舉一途，但不受重視），而這樣的教育制度，其內容主要以四書五經為授課內容，甚至僅熟記八股文，其目的在於方便學生參加科舉，台灣民眾在傳統教育的薰陶之下，也逐漸地在這樣的思想脈絡下受到影響，這也是教育所引發出的作用力，台灣民眾的身體也因為受到這樣的思想影響而使得身體逐漸地成為這樣制度影響下的一部份，這樣的影響在體育發展上，成為不重視身體訓練，在傳統中國的觀念下，認為訓練身體只有那些「武夫」才會去做的事，一般的讀書人對於身體的訓練觀念是十分不足的，因為他們認為這的行為舉止有失禮教，所以老師在教導學生的觀念上，也十分強調行為舉止的自我控制，當然在中國也有重視所謂的武術學習者，他們將武術學習的觀念加上中國傳統的養生觀念相互結合，因此重視許多功夫的練習，最後流於形式；此外，中國傳統能夠在中國這樣的大帝國中獲得安身立命的機會，無非是要經過傳統的文科舉才有機會，雖然「以馬治天下」的滿清，在進入中國後也逐漸感染漢人習氣，而重視文教，武教上雖也不輕廢，但為攏絡大部分漢人士族，仍是以文教為主，因此在清朝武科舉較不被重視，從事武科舉的人相對就較少，這造成鍛鍊身體的

觀念無法透過這個途徑傳達，因此影響大部分中國人的觀念在重視文教，台灣在清朝統治前的鄭氏王朝開始，即接受這種傳統的中國教育，在清朝統治的212年中，雖然為外族統治，但是他們仍接續明朝的統治方式，以便安撫漢人的反抗情緒，另外也施行「雉髮留辮」來壓抑漢民族自我的意識，這種高壓與懷柔，加上清朝歷屆皇帝的賢能，使得這個帝國在受到西方勢力入侵前，可說是世界強國之一，台灣也是在如此的統治下接受大中國的觀念，所以造成在1895之後成為殖民地的台灣一再地反抗日本統治，企圖回歸祖國，但是擁有西方新式武力與觀念的日本已非能同日而語，他們以精練的軍隊對抗台灣的反抗軍，在1902年大致底定台灣的亂事，台灣民眾在這樣的情形下，必須接受日本的新式教育，而其中的內容亦包含體育教育，當時的體育教育主要以軍事教育為主，因為日本受西方思想影響，唯有國民強大，國家才能跟著強大，看到台灣的民眾因為長期在清朝統治下，加上本身又是多樣性的移民社會，在生活習慣上與日本不同，且有三個日人認定的陋習，第一個是吸食鴉片；二是纏腳；三是不重視衛生與時間，這三樣陋習在台灣非常普遍，日本統治時期將這三種陋習完全消除，之後更得台灣進入重視時間觀念、重視清潔、重秩序的情形，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到台灣民眾的思想，受到日本影響相當深遠，這些都是透過教育而來。

另外回到體育教育方面，在日治時期的體育教育內容上，在引入新式教育觀念下，訂立許多新科目，其中一項就是體操教育，也就是體育運動，包含一般的體操之外，也教授田徑、球類運動、游泳等等項目，這些都是台灣人在清領時期從來沒有接觸過的，不僅顛覆了傳統「勤有功、嬉無益」的觀念，重視身體大肌肉的訓練，也改變以

往對於運動的觀念認為是有辱斯文的情形作一個徹底的改變，在這種傳統觀念改變之下，才使得台灣整體對於身體產生不同的認知，也將體育教學視為必須，將運動視為一種身體鍛鍊的觀念建立之下，運動比賽也轉變成為休閒娛樂，或是個人及團體自我達成的人生經驗。在趙汝功一書中提到，西方對於體育教育的觀念即是利用訓練大肌肉的過程，訓練人類的身體能夠適應環境，更能夠在各種情形下生存，日治時期除了達到以上的目的之外，更是透過簡單的集體廣播體操活動，控制台灣人民的身體，目的在於強健國民身體，並且傳達效忠天皇的思想（日治後期），透過廣播體操，在固定時間內限制人民的行動，也就是說，在指定時間下，台灣人民只要聽到廣播放送做體操的音樂，或是口令時，在一開始是不自然的被迫跟著動作，但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另外也在廣播中加入的效忠天皇思想用語，潛移默化的，天天隨著廣播進入台灣人的心中，而體育觀念也在做體操動作下有了效果，人們開始相信體操對於身體是有益處的，體育觀念逐漸產生。¹³再來是在師範教育，及初等教育下也積極的推行體育教育，¹⁴由最基礎的師範教育中教導成為台灣地區的教師能夠將除了一般德、智育的教育外，也包含體育教育的訓練，台灣地區人民經由這一批由師範教育訓練出來的教員，將他們所學實施在台灣的教育上，從初等教育（公學校）開始，學習新式教育，亦同時學習到新式的體育教育觀念（其中不免夾雜殖民統治效忠教育），但是也因為如此台灣民眾在日治時期有了許多的改變，接受新式體育，將運動視為生活的一部份，如參與運動會，觀賞運動競賽，這是在之前所未見的情形，都在日治時期養成了這樣接受新式體育的觀念與思想，這也是台灣進入現

¹³ 黃正安，日治時期臺灣的廣播體操推展情形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59-64。

代化的一部份，也在這種能接受新式體育的教育下，新式運動 - - 棒球，才能夠慢慢的進入台灣人的生活中。

第二節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發展概況

日治時期的棒球發展，包含幾個面向，第一在觀念上的轉變，這一方面不僅是日人對於台灣人的觀念轉變，另外指的是殖民者對於被殖民者那種高人一等的心態，套用張力可《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¹⁵的說法，這是一種「秀異 (distinction)」的心態，表現出來的就是殖民者必須在生活的一切優於被殖民者，而且是自身認定優於被殖民者，以顯現個別的不同，讓台灣人認為自己比日本人低下，而這種觀念的轉變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發展有何關係？這與台灣棒球進入台灣人社會有正相關，因為台灣人在這樣的情形下，一開始看到棒球這種運動，是覺得奇怪的，而日本人存有這種「秀異」心態，認為台灣人無法接觸這種運動，也玩不起這種有些昂貴的遊戲（主要是因為球具昂貴），直到後來出現同化觀念時，才使日本人對於台灣人的觀念，從殖民者漸漸視台灣人為同胞，另外台灣人對這種新式運動，從認為是「拿著棒子亂揮」的遊戲，也漸漸懂得欣賞，且在日本人開放之下逐漸的參與，才有後來的嘉農（嘉義農林學校，後與嘉義師範學院合併成為現在的嘉義大學）棒球隊打入甲子園，獲得亞軍榮銜的事蹟，更影響到光復後台灣的棒球發展，以下就棒球傳入背景作一介紹，以瞭解這種情勢的轉變。

¹⁴ 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台北，師大書苑，1998年，頁1-158。

¹⁵ 張力可，〈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棒球運動最早從美國經由傳教士傳入日本，日本人留學生平岡熙前往美國留學之後，從美國帶回一顆棒球，並將它解剖開來研究其中的構造，仿製它的作法重新再製造出一顆新的棒球，這也使得日本人瞭解棒球的構造，開始「玩」這項新式運動。這項運動雖然傳入日本，但是在開始並不為大眾接受，就連官員們也認為這是一種「小孩子的遊戲」，不值得推廣，但是在1903年（明治36年）開始由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之間舉辦校際的的棒球賽（在日本最早的學生球隊是開成學校棒球隊，成立於1873年也就是棒球傳入日本的同一年），引起兩校之間的學生瘋狂的投入比賽，以將對手打敗作為最終目標，甚至到後來更引發兩校應援團（加油隊）之間的衝突，造成兩校學生各有受傷的情形，日本當局認為此風不可長，因此下令禁止比賽的進行，這項比賽稱之為「早慶戰」，¹⁶在1911年8月（明治44年8月）由朝日新聞社提出「野球（即棒球，日本漢字）害毒論」的說法，他們經由調查分析認為棒球的好處，第一是勝於其他團體運動，充滿趣味性；第二是適合野外的遊戲；第三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重視團體的優點。壞處上為，第一需要大場地與長時間的缺點；第二耽於遊戲的學生成績表現不良，第三因為比賽的情形導致有粗暴，或是沈迷於勝利後的慶功上的酒食導致品行低下；第四棒球選手佔據運動場地練習或比賽，妨害其他運動進行；第五應援（加油）行為中，有不規矩的情形出現；第六棒球運動導致身體發育不良，產生神經衰弱、肋膜炎 等等病症發生，另外加上學校之間的對抗也產生許多弊害，因此朝日新聞社提出了「野球害毒論」，後來經過日本當時棒球界人士，召開「野球問

論文，1999年。頁30-34。

¹⁶ 早慶戰指的是在1904年（明治37年）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創立者大隈重信）與慶應義塾（後來的慶應大學，創立者福澤諭吉）之間的棒球對抗賽。功力靖雄，《明治野球史》，頁104-128。

題演說會」(前後兩場分別為1911年9月16日與23日),重新看待棒球運動,由棒球擁護者安部磯雄與押川春浪出版《野球與學生》一書,確立棒球的定位與貢獻,而停止了這場紛爭。¹⁷而早慶戰的影響直到後來,在1915年的全國中等學校優勝大會的全國高校棒球聯賽中重現,這項比賽因為主要的決賽場地在甲子園,¹⁸因此也稱之為「甲子園高校棒球聯賽」,更帶起日本另一個棒球風潮,這股風潮流傳至今已成為日本的棒球傳統。

棒球運動傳到台灣約1897年左右,在當時「是要說佔領台灣二、三年的棒球,如果拿著球棒做揮棒動作的話,會使人忽然想起瘋狂的人拿棒子在做夜遊」後來出現有人玩棒球「是明治30到31年(1897-1898年)左右的事」,¹⁹主要是來台灣工作的日人在工作閒暇,所從事的休閒娛樂。而他們進行運動的場所叫做「魚金之處,當時稱為愛知館 在其附近側方有一片大自然草茫茫的場所,在那兒握著球棒,以頗為怪異的姿勢打擊,使球飛出」。²⁰當時的棒球運動只能說是粗淺的,幾個人之間的接傳球與打擊的遊戲,之後到了1906年3月台灣成立了第一支正式的棒球隊,是由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校長田中敬一發起成立,之後在國語學校師範部也相繼成立棒球隊,並且展開了兩校之間的棒球對抗賽,形式類似在日本的「早慶戰」,後來國語師範部因為主要的目的在師資培育,由於學期修業年限短,學生

¹⁷ 功力靖雄,《明治野球史》,頁145-149。

¹⁸ 甲子園1924年設立,因為歲次甲子,因此稱之為甲子園,這個場地成為日本高校學生棒球的聖地,所有學生努力都是為了在這裡求得好成績,以使他們的青春無憾, <http://sports.yam.com/show>。

¹⁹ 蔡宗信,「日據時代台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 - 以1895(明治28)年至1926(大正15)年為中心」,國立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中所引用出版於1916年的雜誌《運動?趣味》中所描述,頁15-16。

²⁰ 同上註,頁16。

流動性大，導致棒球隊的陣容變異性大 等等的因素而無法繼續比賽，取代她的則是成淵學校（此校由來台日人夜間進修的東門學校與台灣學習會在1906年7月合併而成），²¹繼續這項在台灣北部進行的賽事，但是因後來在日本的「早慶戰」發生應援團（加油隊）暴動的情形，使得日本在台當局擔心台灣也發生同樣的事件，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剛剛進入台灣統治，擔心台灣人有可能因為如此而引發另一場暴動，所以台灣總督府中學校新任校長本莊太一下令禁賽，棒球運動因此暫時在學校中消失，之後這一批學生轉往社會發展，他們在社會上自行組成球隊，如中學校隊自行組成一名叫「F俱樂部」的球隊，藉以繼續他們的球隊活動，²²同時期還有在1909年（明治42年）成立的「霜月俱樂部」、「高砂俱樂部」...等等球隊，²³但是以中學校為主的學生棒球盛會，也逐漸的在各個公家機關成立的球隊中，如「鐵」隊、「雷」隊（總督府人員組成）、「台北廳」隊、「法院」隊等等，²⁴轉型為社會型態的球隊，且在1915年（大正4年）成立了北部野球協會，結合當時北部的社會球隊（前後共有20支球隊）進行比賽，之後1922年（大正11年），台灣體育協會成立，而北部野球協會也就併入體協之中，在這不同階段的協會成立過程中，台灣北部的棒球運動更是如火如荼的展開，由《台灣野球史》一書中記載，當時由北部野球協會與台灣體育協會舉辦的各式比賽，不下數十場。直到1926年（大正15年）6月台灣體育協會更在各地先後成立其他支部，如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嘉義、花蓮港台東等支部，並且也相繼的舉行的棒球比賽，在社會球界可說是全台灣都在開始有了棒球活動。經過這一時期的社會

²¹ 謝仕淵、謝佳芬著，《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城邦文化出版社，2003年，頁22。

²²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2年，頁9。

²³ 同上註，頁10。

²⁴ 同上註，頁10。

球隊的發展之後，在1917年（大正6年）又重新有學生球隊的成立，首先成立的是台南一中棒球隊，之後在1919年（大正8年）少年棒球隊也開始發展，全台灣共有29所小學校（日人就讀19所）與公學校（台人就讀10所）棒球隊成立。²⁵

在1915年（大正4年）開始的全國中等學校大會（高校棒球比賽，即後來的甲子園大會），隨著日本統治勢力擴大，也將此風氣延燒到其他地區，接續是北海道在1920年（大正9年）朝鮮及滿州在1921年（大正10年）等，這些日本殖民地也參加這項棒球大會，台灣則在1923年開始舉辦台灣島內的台灣大會，首屆參加隊伍有台北一中（前身為總督府中學校）台北工業、台北商業、台南一中，²⁶目的是要經過比賽之後選出代表參加全國大會，這也成為後來嘉義農林學校能夠代表台灣在甲子園奪得亞軍榮銜的前奏，從這時候開始，棒球運動又重新回到學生運動中（從1907年被禁止之後），而在蔡宗信的說法中，最主要台灣能夠發展棒球運動是因為，第一體育運動風氣的轉變，因為早期剛進入台灣統治，在政局未穩的情形下，體育風氣可說集中在軍事用途上，就如蔡宗信所說「練武」的功用，但是隨著台灣的亂事漸漸的弭平，日本在台當局也開始提倡體育運動，成為日人的生活消遣；第二是因為許多愛好棒球人士的推動，除了最初支持成立總督府中學校的田中敬一校長外，更舉出許多本身曾經是棒球選手，在擔任職務之後，仍回頭參與棒球的推動，這種發展現象主要是以台北為中心向外擴張，替台灣奠定棒球基礎，²⁷但是這中間主要參與的人員是

²⁵ 蔡宗信，日據時代台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 - 以1895（明治28）年至1926（大正十五）年為中心，頁101-108。

²⁶ 同上註，頁98。

²⁷ 同上註，頁77-85。

以日人為主，台灣人仍是少數。

台灣人真正參與棒球運動是要從台灣人本身對於新式體育觀念的轉變，加上其面提及張力可所說日人「秀異」心態的轉換，殖民者願意將他們生活圈的遊戲，教導台灣人並使他們能夠參與其中，台灣在日治初期對於日本當局的反抗，導致日本本身的「秀異」心態之外，更包含對於台灣人反抗的畏懼擔心，因此在前面提及的中學校與國語師範部的棒球賽之所以禁止，這個因素佔有很大的成分。加上台灣人對於新式體育從一開始是瞧不起的心態，認為這種體育教育違反了傳統禮教觀念，對於實質修養無益，因此不太能接受，但是隨著日本人的推廣與運動會的舉辦，台灣人也從看熱鬧中漸漸理解運動的趣味，並且開始加入其中，約在1912年（大正元年）左右，台灣人已經不排斥新式體育，1920年（大正9年）在運動會上也開始有超越日人的情形，1925年（大正14年）在社會上有提倡運動團體成立。²⁸由這樣的觀念轉變，才有後來棒球隊的參與，在前面有提及小學棒球隊中，共有29所學校有球隊，其中10所是台灣人為主就讀的公學校，與1925年參加中部棒球大會的台中一中（為林獻堂等所創辦）之外，還有令人驚奇的能高團以及嘉農。

1921年（大正10年）一支出現在台灣東部的棒球隊伍，一支由阿美族組成的隊伍成為令人驚奇的台灣隊伍。1921年，花蓮人林桂興在花蓮工作的閒暇，無意間在秀姑巒溪畔發現一群阿美族的青少年利用木棒與石頭，做出投打的動作，其中一位可以把石頭丟得飛快且距離又遠，於是林桂興向前詢問得知他們是住在舞鶴社的原住民青少年，

²⁸ 同上註，頁90。

而那位可以將石頭丟得飛快的青年叫做查烏馬。後來林桂興教導他們玩真正的棒球，而其中一位叫做辜茂得能接住查烏馬的快速球，於是他們兩個為中心，配合鄔新、阿仙、亞拉畢、紀薩、羅道厚、羅沙威、杉提揚、武諾、爾西般、亞仙哈利陽、屈追、杜易爐等十二位少年組成了「高砂棒球隊」。²⁹

1923年（大正12年），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與林桂興任職的旭組營造廠董事長梅野清太，³⁰將這群原住民少年全部移至新成立的「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就讀，並將他們改名為「能高團」³¹棒球隊。除了看中原住民天生的能力外「他們身體的運動能力也是非常優秀，因為蕃人（原住民）從小的時候，就有為捕捉小鳥用投石頭來打鳥類的風俗習慣，因此他們投球的正確性是天生而來 加上他們跑壘速度相當地快 是內地人（日本人）選手所不及的 體力的強健對於打擊也是相當地有利」，³²「並且我相信教導他們棒球，是增進他們教化程度最近的一條路」，³³其次是希望透過棒球增進原住民的化程度。之後他們前往台灣西部進行比賽，雖然有輸有贏，但是他們天生的能力與拼戰精神，在在受到當時在台日本人的肯定，於是由江口廳長出資，前往日本本土挑戰，贏得更多驚呼與讚嘆。隨著其中四名主力隊員阿仙（稻田照夫）、羅道厚（伊藤次郎）、羅沙威（伊藤正雄）、紀薩（西村嘉造），被球探看中前往日本發展，球隊因為人員減少而瓦解，但他

²⁹ 簡永昌，《中華棒球史記》，台北，簡永昌發行，1993年，頁8-9。

³⁰ 此人為當時承造東部鐵道、花蓮港、臨海道路工程。同上註，頁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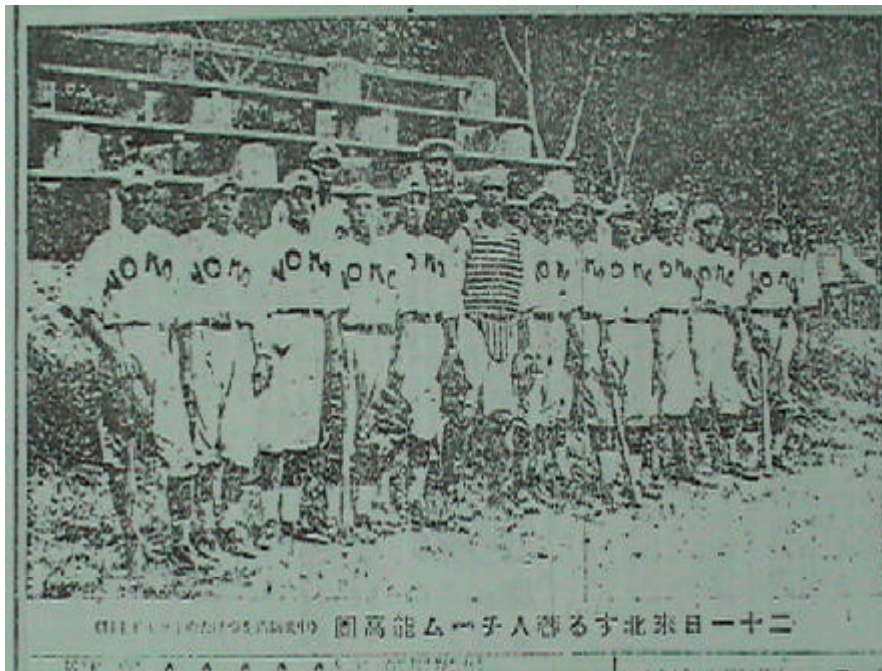
³¹ 「能高」所指的是在花蓮當地的高山 - 能高山（高3261公尺），希望球員表現如能高山一樣雄偉。同上註，頁9。

³² 蔡宗信，日據時代臺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以1895（明治28）年至1926（大正15）年為中心，第四章第三節註27。

³³ 同上註，第四章第三節註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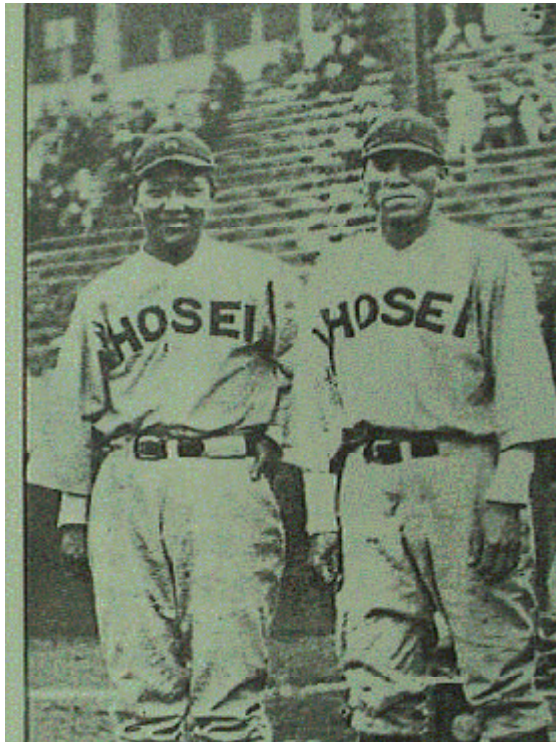
們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東部的棒球發展有著無比的刺激作用，使得從日治時期開始，台灣東地區原住民對於棒球便十分熱愛，甚至影響後來紅葉隊的出現，說明台灣東部棒球運動的發跡並非偶然。

圖1 能高團棒球隊



資料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24年（大正13年）9月18日。

圖2 能高團中的羅道厚（圖右）在日本法政大學時的照片



資料來源：高正源，《東昇的旭日》，台北，民生報出版，1994年，頁33。

另外一支由台灣人、日本人、原住民組成的球隊就是嘉義農林學校所組成的嘉農棒球隊。在日治時期嘉義地區因為嘉南平原的廣闊與氣候，適宜種植經濟作物之一的甘蔗，所以在那裡設立了糖廠，那裡員工在工作之餘，為了有一個打棒球消遣的場地，因此由糖廠決定在1917年（大正6年）蓋了一座大小合乎標準的簡易球場，也增加了嘉義地區民眾參與棒球的機會。1928年（昭和3年）嘉義農林學校的學生就在這種環境之下也培養出一支高中球隊，並且邀請了日本教練近藤兵太郎擔任教導學生棒球的工作，而近藤教練對於當時在學學生多半是台灣籍學生並不為意，且一再強調只要能打好球，能承受他嚴格訓練的學生，不論是什麼身份，他都會讓他有上場的機會，也因為如此，台灣學生在不會因受歧視而不能上場的消息傳開，許多台灣想打棒球的學生，紛紛以加入嘉農為第一志向，也因為如此，使得嘉農棒球隊的先發選手中不乏台灣選手，球員名單如下：陳耕元、東和一、吳明捷、過茂、拓弘山、羅保農、李詩計、鄭登臨、蘇正生、劉蒼麟（以上為台灣球員）、岡本武雄、穀口邦雄、岡本良雄、小裏初雄、後藤健三、川原信男、福島又男、崎山敏雄、裏正一、谷井公好、積真哉等球員，為嘉農第一批球員。³⁴

經過近藤教練嚴格的訓練之下，嘉農棒球隊在1931年（昭和6年），參加台灣高等學校棒球選拔賽中，終於打敗了純為日本人組成的臺北商校棒球隊（嘉農在成軍之後，參加選拔賽從未獲勝過），取得了代表台灣參加日本甲子園高校棒球聯賽的代表權，³⁵這支由三種

³⁴ 同上註，頁67。

³⁵ 日本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才正式開放讓台灣球隊有參加甲子園的機會，除了昭和三年

人種組成的的球隊竟然打進日本的甲子園，這個日本高校的棒球最高殿堂，雖然最後輸給了中京商校獲得亞軍，但是他們的表現卻深深烙印在日本人的心中，其中投手吳明捷更成為台灣、日本家喻戶曉的人物，在《台灣野球史》一書中提到，由於他優異的表現，使得當時的報紙紛紛報導他的消息，其中一則說明他是出身苗栗的人，原先是一位網球選手，後來才加入棒球隊，他的義兄（姊夫、大伯或是乾哥）就讀京都立命館大學的張錦昌先生曾說，吳明捷在公學校時就擅長網球、游泳等運動項目，個性溫順、成績中上、品行優良 誇獎他的話。³⁶值得一提的是，陣中的原住民選手選手也受到注意，如上松耕一（原名????）、真山卯一（原名????）、東和一（原名????）、平野保郎（原名??），他們的身份也在出名後被提出，³⁷替這支球隊增添許多驚奇的色彩。

（1929年）的臺北一中打進四強之外，其餘代表隊都在第一戰落敗而遭淘汰。同上註，頁68。

³⁶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頁435-436。

³⁷ 同上註，頁436。

圖3 第一屆嘉農棒球隊取得台灣選拔賽冠軍



資料來源：高正源，《東昇的旭日》，頁59。

圖4 第一屆嘉農棒球隊從日本獲得亞軍歸來的照片



資料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昭和6年）8月31日。

台灣人能夠打棒球對於當時的台灣人而言是非常難得的，除了身份問題之外，要能夠有錢進入中學讀書，之後又要與學校佔大多數的日本人競爭成為校隊的一員，最後進入球隊成為球隊的主力選手，得經過很多努力之外，還要加上家裡的人必須不會反對參與棒球運動，不然在當時的台灣人觀念仍認為棒球只不過是一項遊戲，不能以這種東西養家活口，這樣不事生產的在球場上浪費時間，對於改善家中經濟可說是毫無益處，但在蔡宗信一文中提到，在1929年（昭和4年）成立於宜蘭的白英棒球隊，其中第四任隊長湯樹根敘述當時他們父母一致認為棒球不僅無濟於民生經濟，更有可能因為跟日本人打棒球而被冠上「反日」的名號，所以家長極力反對，直到「當多數白英隊友被家長發覺經常打球時 他們（已經）奪得了宜蘭地區B級棒球賽冠軍，台灣人打敗日本人的消息不脛而走」，³⁸ 前去觀看「台灣人打日本人」的人也越來越多。因此從這裡，蔡宗信認為台灣人在日治時期的棒球運動，在小學階段發展較好，主要是因為年紀小日本當局較少反日顧慮，成長之後球具的昂貴，加上技術不如日人及「反日」顧慮，自然就會被淘汰，因此他認為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打棒球的情形，無法在日人主導的熱潮中快速發展，³⁹因此在技術層面上，所獲得的傳承機會相對的也減少許多，反映出在戰後台灣棒球發展不進反退的情形，並非毫無來由。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也將他們近代化的成果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殖民地子國，台灣人民在日本統治下由完全農業的社會逐漸的地走向近代化、初期工業化

³⁸ 蔡宗信，〈日據時代臺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以1895（明治28）年至1926（大正15）年為中心〉，頁95，所引註44，高嘉南，〈白英棒球隊成立五十五年 - 宜蘭棒運綿延不息〉，《體育世界》111，1984年5月，頁30。

³⁹ 同上註，頁96。

的路程（尤其在二次大戰時期，為了生產戰爭必需品），因為他們的影響也使得台灣人在觀念上有了轉變，體育活動也隨著日本的發展由軍事取向，演變至生活休閒的取向，雖然主體仍是以日本人為主，但台灣人多多少少也受到影響，並將這種觀念傳承下來，如此當新政府的到來，台灣的體質上已經可以與大陸方面接軌（甚至超前），而不至於呈現完全脫序的現象，但是接下來的情形卻因為私人政權的獨裁，導致台灣的體育發展，甚至是單項的運動項目 - 棒球，也因為政治因素而影響其發展的路程，因此筆者欲先探討中國大陸上體育思想與政策的演變，以說明其影響台灣棒球在戰後的發展現象。

第三章 近代中國體育思想的形成與戰後體育政策的制訂

近代中國是中國進入現代化的轉捩點，因為這個時期中國由原先一個封閉而古老的帝國，在遭受到外來勢力的入侵之後有了急遽的轉變，中國進入了另一個進程，在面對外來勢力威脅之下，必須做一個回應以避免滅亡，因此在1840年開始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與有認知的官員認為必須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才有辦法「師夷長技以制夷」，不然中國將面對洋人的洋槍、洋炮而無所適從，再加上中國在處理內部的大平天國之亂（1851年-1868年）時，曾見到西方人運用他們新式的武力，在南京一帶幫助清朝軍隊打擊大平天國軍隊，使得當時帶隊的中國官員見識到西方軍隊的進步與武力強大，因此從1861年-1894年（咸豐十年到光緒二十年）進行所謂的「自強運動」，希望透過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能夠使中國擺脫外來勢力所造成的屈辱，但是事與願違，這個運動原先是希望從上到下一起施行的改革運動，到頭來卻成為只有少數有識之士的獨立作業，這些有識之士主要是曾經與西方人直接或間接接觸的地方官員，但是皇室與一般老百姓仍是無法全心全力的配合，成為幾個省分實施自強運動，其餘則維持原狀的特殊現象，這些實施運動的地區大多是集中在沿海或沿長江的省分及都市，再加上僅學習西方強大的表面，透過購買武器、成立新式軍隊，卻無法學習也不願學習西方的制度與思想，在這樣的情形下，「自強運動」只是掛著學習西方的空殼，而這個事實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做了一個總結，因為日本明治維新是從整體的改革做起，上至皇室下至一般老百姓，整個國家徹頭徹尾的改變，在中日

甲午戰爭中一戰成名，打敗了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地位也一下子從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對象，轉變成為西方列強的競爭對手之一，更成為入侵中國的一份子。

這時候的中國知識份子才明白，要學習的不僅是表面的「船堅炮利」，而是要從制度面開始改革，甚至思想上也必須改變，有名的就是康有為與梁啟超師徒，他們從思想上要求改變，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希望透過中國傳統思想傳達給民眾改革的觀念，與建立在《大同書》中提到的中國式的「烏托邦」理想。而他的學生梁啟超也提出「新民說」，⁴⁰希望中國民眾能夠接受新觀念、新知識，成為新的國民；當然還有其他知識份子也相同的提出希望從思想做起的改革運動，而他們的這種想法終於上達光緒皇帝，他本身也是一名想勵精圖治的年輕皇帝，於是他招來康有為及他的同志，希望從制度面與思想面進行改革，而這場變法運動只維持了百日就因為保守勢力的反抗而宣告失敗，變法人士遭到殺害（如譚嗣同）或流亡海外（如康有為、梁啟超），史稱「戊戌政變」，一直以來權力受到慈禧太后控制的光緒皇帝，更面臨到軟禁的下場。直到1900年（光緒26年）的義和拳亂，引發八國聯軍，才再次使得清朝的統治受到質疑，於是由保守派的皇室發起一連串的改革運動想挽回頹勢，卻也為時已晚，因為在1894年由孫文等人成立的革命勢力，早已萌生推翻滿清的思想之後更將其實現，而達到建立民國的夢想。再來觀察同時期的下層的民眾，他們因為西方勢力的進入，以及政府一再改革的環境下，接觸到新知識、新觀念也跟隨著有「啟蒙」的現象出現，

⁴⁰ 《新民說》是由梁啟超1902年在《新民叢報》以連載的方式提出，內有 論公德、 論國家思想、 論權利思想、 論自由、 論進步、 論合群 訪美歸來後在1903

在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⁴¹中提到，這時候不論身份職業，能夠出入茶樓、酒館，亦或是一般的戲院的民眾，在那裡都有知識份子或是識字的人教導民眾看報，或是以說書方式解說時事，甚至以戲劇方式來表現政局以及西方思想，以這種與傳統結合的方式，教育啟蒙民眾。因此在這樣的情形下，新的教育觀念也在科舉制度的廢除之後，進入中國的教育。其中就包含了新式的西方體育教育。從清末民初的整體的改革與演變，影響不僅是近代中國，更影響到後來從大陸遷移至台灣的國民政府，這裡必須先強調一點，那就是教育無法完全獨立於政治，它必受政治的影響而有所改變，甚至違反了教育的初衷，這也是我們必須從思想層面談起，再看到政策面的影響，因為政策的影響等於就是直接的影響教育本身，體育屬於教育的一環，當然也無法擺脫這種宿命。接下來筆者將從中國近代體育思想的演化，論及政治因素的影響，藉以解釋為何有這樣的政策制訂，與國家體育的發展方向。

第一節 清末民初~抗戰前的中國體育思想

清末的時代背景可以看出，中國在羸弱的狀態下希望重新強大，因此吸收西方的強大因素，希望能擺脫屈辱，一開始仍舊是以表面所看的船堅炮利為主，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才完全的朝向制度面的改革，這時候只要能夠讓中國強盛的，或是針對中國衰弱部分的解決方針都會被採納，只是各種方法的接受也隨著為使讓中國人民容易接受，有了適度的調整，其中體育即是如此。中國早期本身也有自己的

年撰 論私德 ，1904年撰 論政治能力 ，1905年撰 論民氣 。

⁴¹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套訓練身體的方式，其最大的目的乃是透過身體的訓練以達到身心的提昇，並且以養生為最大目的，因此有「靜坐」以調氣息，活絡筋骨以使血氣通暢等等，另外即是身體筋脈的研究運用到醫學的治療上，如針灸，這是中國傳統的智慧結晶，但是在清末的知識份子看來，這些傳統在受到西方侵擾之時，卻完全發揮不了作用，如陳獨秀曾在1920的《新青年》主張體育應戒拳術，說明對於傳統武術的厭惡，⁴²而主要造成這種直接的影響的想必是在1900年發生的義和團拳亂，結果引發了八國聯軍，中國的皇室四處竄逃更成為中國的恥辱，因此中國傳統武術除了前面提及，在知識份子心中較不被重視外，更引起其他不好的聯想，這時候從西方引進的新式體育，成為眾家寵兒，其中最受歡迎的就屬軍國民教育的體育教育。

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這種以訓練國民成為軍事用途的體育教育思想，為何成為中國清末民初的寵兒，最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對外關係上的連年失利，加上本身追求重新強大的趨力使然，中國在這一方面的思想來源最主要來自於鄰國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成為亞洲第一強國，更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證明，中國的知識份子如梁啟超即在《新民叢報》中的尚武論提出：「我以病夫聞於世界，手足癱瘓，已盡失防護之機能，東西諸國，莫不磨刀霍霍，內向而魚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惡根，一雪不武之積恥，二十世紀競爭之場，寧復有支那人種立足之地哉！」，⁴³說明這時候中國的困境，而習法日本主要是因為日本的文字與文化和中國較為接近，當時的官方大多鼓勵知識份子留學日本，加上明治維新的成功使中國獲得教訓與莫大的屈辱（甲午

1992年，頁59-201。

⁴² 陳獨秀，青年體育問題，〈《新青年》第7卷第3期，1920年，頁319。

戰爭的失利)，因此在1902年（光緒28年）由慈禧太后帶領皇室發起的改革運動，其中的「欽定學堂章程」與1903年的「奏定學堂章程」皆抄襲於日本，⁴⁴而日本本身又是接收西方的新式教育，其中也包含了軍國民的體育，如歐洲的強國德意志帝國，在經過1870年的普法戰爭之後，宰相卑斯麥提出的「鐵血政策」，成就了後來德意志走向軍國主義的路途，且因如此更在他們的擴張中獲得好處，國家也從各個分散的城邦結合成強大的國家，都是拜這軍國民教育所賜，如「德國青年公民教育」中提出主張在小學畢業至服兵役期間的青年，應實施1.身體之鍛鍊；2.國家意識之教養；3.愛國精神之涵養；4.尚武氣氛之振起；5.經濟思想之發達；6.經濟能率之提升；7.科學知識之普及，其中前面四點與建立愛國心，鍛鍊自身成為保衛國家的利器，尚武精神的提倡，主要是在凝聚城邦之間，對於新的大一統帝國表示效忠，這樣的思想成為日本效法的對象之一，因為德國的情形與日本明治初年的情形若合符節。⁴⁵中國方面在學習日本時也跟著學習許多歐洲的思想，軍國主義的體育思想也因而進入中國，1906年學部尚書榮慶即奏請宣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點成為教育宗旨，⁴⁶民國肇造，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明訂軍國民教育為教育宗旨，繼蔡元培之後的教育總長范源濂，亦在1914年發表「今日世界大戰中之我國教育」⁴⁷一文，提出「全民皆兵」的想法，目的希望透過這樣的教育以充實國力，而這影響在1915年全國教育聯合會中提出的「軍國民教育實施之案」。

⁴³ 梁啟超，新民說 尚武論，〈新民叢報〉第28號，1902年。

⁴⁴ 汪向榮，〈中國的近代化與日本〉，台北，百川書局，1988年，頁53。

⁴⁵ 日本在明治天皇，「大政奉還」之後，急欲建立一個以天皇為唯一效忠中心的國家，以結束多年國家分裂割據的幕府時期。

⁴⁶ 瞿立鶴，〈清末民初民族主義教育思潮〉，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頁110。

⁴⁷ 范源濂，〈今日世界大戰中之我國教育〉，〈中華教育界〉第23期，1914年。

這種軍國民體育教育的思想影響直到1918年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因為以軍國民教育著稱的德國戰敗，其餘戰勝的協約國鼓吹平民主義（尤其是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以及「民族自決」），加上國內的新文化運動興起，高唱民主與科學，對於工具性利用的軍國民主義多所批評，軍國民主義因而衰退。但是軍國民主義在學校體育與社會體育方面有很大的影響，根據許義雄《軍國民教育之體育思想（1880-1918）》的分析，⁴⁸在學校方面，1.體育概念的建立，根據其文章分析，「體育」一詞的傳入約在1897年（光緒23年）11月左右由日本傳入，而對於當時的知識份子認定體育 - 乃提倡尚武精神，並且與衛生觀念結合，如此才能達到強健身體。2.體育內容，鼓吹教導兵式體操，卻因中國學生體力無法勝任，在1920年代從學校教育中逐漸取消。武術的提倡，重新建立對於武術的概念，並非只是拳匪、拳亂的代表者，而是能達到強身健體新武術，但是後因新文化運動的推展，使得代表中國傳統的武術也受到批評。3.體育方法的運用，軍事管理的觀念影響到學校教育，要求一切整齊劃一，服從秩序；另以軍人充任體育教師，主要是因為當時雖然有新式體育教育的觀念，但是受過正式體育教育的教師人數卻短缺的嚴重，因此以軍人替代，教導軍事體操，卻造成以後教育界的問題。對於社會方面的影響，一個是女子體育的提倡，梁啟超認為中國女子在傳統教育下，也應學習西方參與體育活動；再來是各地方的體育會成立，因此整體看來，軍國民的體育思想，最主要影響的是整體體觀念的建立，也影響到學校方面的教育一直有著軍事教育的陰影，而軍國民主義教育也在後來政治局是受到日本威脅時再度復興，這將在後面提及。

⁴⁸ 許義雄等著，《中國近代體育思想》，台北，啟英文化出版社，1996年，頁37-121。

另外隨著列強的入侵，跟隨其後的就是傳教的力量，而清末時期的傳教士力也影響中國教育思想，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即是，基督教青年會之體育思想，這裡提到的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簡稱YMCA），於1895年進入中國，其背景與清末列強的入侵與伴隨著入侵的傳教事業有關，這不僅是單純的傳教活動，也影響了中國清末時期的教育，其中也包含了體育思想。在體育方面，基督教青年會對於中國的影響，根據蔡政杰《基督教青年會之體育思想（1895-1928）》中提到，⁴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是新式運動的介紹與傳入，包含籃球、棒球、田徑項目等等；第二是新式運動的推廣，包括中國全國運動會的推廣，1910年10月18~22日首度在南京舉辦，項目即包含球類與田徑運動等等；第三為體育人才的培育與學校體育教學的協助，而基督教青年會對於中國的體育影響，也隨著中國陸續取回主權，而逐漸淡化，但是新式體育教育觀念與新式運動的傳入推廣，都不難看見基督教青年會留下的影響。

隨著西式的體育傳入中國，中國方面也產生對外國體育的反抗聲浪，洋土體育思想的論爭因而產生，為何有洋土體育思想的論爭，其爭執點在於中國在清末以來受到西方勢力的侵入，與傳統文化之間的衝突不斷，尤其在1919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追求西方的科學與民主，這時候出現一派支持所謂的「平民主義」（或稱之為民主主義）的體育教育，強調以自然的方式教育，例如軍事體操就不是自然教育的一環，以實施一般體育運動為主，並強調比賽競技的重要，且教導以公平競爭為比賽的主旨，這個教育思想影響到後來學校的體育教

⁴⁹ 同上註，頁123-198。

育，強調自然教育法捨棄原先的軍事管理，但由於中國在當時受過真正體育教育的教師師資十分短缺，多半以退役軍人為替代，而強調自然教育的方式反而造成這些老師在教學上的誤解，而形成「放羊式」教學，只要在上體育課時，教師不需教授任何課程內容，僅需看學生想做什麼運動，就做什麼，成績評比多以出席觀之，失去原先平民主義教育思想下，自然教育的體育教學法（這種教學法強調重視人本思想，從訓練人體適應環境為出發點）；另外在基督教青年會傳入國外的體育思想，教授中國民眾有關於新式運動，更提倡運動會的舉行，使得許多學校為了標榜採用自然主義教學，反而過度重視人才培訓，目的是為了在運動會場上奪取名聲，而造成學校內訓練出一批專門參與競技的學生，卻成為學校正常教育體制下的特權份子，這些弊端使得體育界人士重新正視傳統體育教學的必要性（即國術的發揚），因而產生所謂的「洋土體育」之爭，爭論的論點有，第一靜動之間的爭議，中國傳統武術訓練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養生，重視身體中「氣」的循環順暢，因此養「氣」成為訓練身體的重點，靜坐是養「氣」的方法之一，因此在中國傳統的身體訓練上，靜坐為必要的功夫；相較於西方的體育觀念，西方的體育在身體的訓練上，重視身體大肌肉的運動，因此從古老的希臘時代已有的運動比賽（奧林匹克運動會），在19世紀末年，兩次工業革命之後，人們開始重視休閒運動，這些運動項目成為工作之餘的消遣，但是跟隨著工業革命之後的西方社會逐漸形成新帝國主義，為了各自的利益而向外擴張，因此體育運動也被利用在軍事訓練上，但是無論是原始的運動或是後來的軍事訓練，都是動的方式來訓練身體，動靜之間的差異性成為論爭的重點，表現在實際面，中國傳統的武術在1900年曾經引發了八國聯軍，而西方的體育訓練在軍事運用上使他們在擴張時無往不利，應學習西方的強大或

是學習中國的養生，成為爭論的要點。第二在「選手制」與「競技制」的爭論，基督教青年會進入中國之後，積極推廣西方的新式教育，其中也包含體育教育，他們所施行的即是平民主義與自然主義的體育教育，重視每一個人受教的權力外，更重視基本的體育教育，因此引介許多新式的運動，如棒球、籃球、田徑 等等，並且積極的訓練中國的學生成為運動選手，也推廣運動競賽的進行，許多學校由於外國教師人數仍佔少數，使得這種自然主義下的訓練選手和運動競賽的推廣，為中國國內受過短期訓練的體育教師所誤解。

當1924年收回教育權之後，所有的行政觀念也跟隨著轉變，訓練選手的目的在於增加學校名聲，因此養成前面提到的「選手制」的狀態，而這些選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競技，完全違背自然主義的體育思想，也成為支持傳統者詬病之處。根據許光廬《洋土體育思想之論爭（1915-1937）》⁵⁰中提到，他認為洋土體育論爭的導火線是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因為長久以來中國處於被外來勢力壓迫的狀態，並且在國外基督教的教育推廣之下，參加並舉辦多項運動賽事如1910年開始的全國運動會、1913年與菲律賓、日本合辦的遠東運動會，雖然每屆成績雖不甚理想但也逐漸有運動風氣的形成，直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隔年，第十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國民政府決議不派選手參加，但是日本方面卻派出偽滿州國的選手參賽，全國輿論譁然，最後臨時決議派出選手劉長春參賽，但是卻在預賽中遭淘汰，於是在1932年8月7日天津大公報的社評中提出「今後之國民體育問題」，內容論及劉長春失敗的消息，也說明出西方的體育思想在中國的不適用，因為西方人的體質與中國人的體質本來就不相同，

⁵⁰ 同上註，頁199-282。

依照西方體育的訓練方式除了少數人能適應外，對於從傳統進入現代的中國人來說，體質普遍仍羸弱，因此勢必要尋求適應中國人體質的體育教學才行。⁵¹由於1928年中國進入在民國之後真正的統一政府成立，直到1932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第一屆的全國體育會議，並且擬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規定各主要體育管轄的行政機關：「甲、教育部：1.教育部體育委員會。2.主管體育科。3.主管體育之督學。乙、各省教育廳及行政院直轄市教育局：1.省市教育廳局體育委員會。2.主管體育股。3.主管體育之督學或指導員。丙、各縣市教育局：1.縣市體育委員。2.主管體育組。3.體育指導員」。⁵²官方體育組織正式成立，結合已經逐漸制度化的中國傳統武術，加上西洋體育教育，而進入了融合期。但是跟隨著戰爭的來臨，一切的觀念又轉向為戰爭服務的體育教育為主。

第二節 中日抗戰時期前後的體育思想與政策制定

自清末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證明他們在亞洲上的地位，1905年的日俄戰爭獲勝，日本成為世界強國之一，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更趁勢侵入中國山東地區，提出二十一條要求，⁵³對

⁵¹ 社評 今後之國民體育問題，《大公報》第一張第二版，天津大公報社，1932年8月7日。

⁵² 教育部主編，《第一次中國教育評鑑（丙編）》「教育概況第六社會教育概況」，1933年，頁897。

⁵³ 日本早欲奪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於是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對德宣戰，以與德軍作戰為理由，出兵山東，並強佔德國控制的膠州灣及膠濟鐵路沿線。日本並不以佔據中國山東為滿足，遂於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主要內容有：1.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2.要求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東部享有的一切權利。3.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4.中國沿海各海灣，不得租與第三國。5.中國政府須聘日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警察和兵工廠須多聘日人及由中日合辦，日本在浙、贛、鄂、閩、粵等省享有經濟特權。國立編譯館，《中國現代史》，台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88年，頁56。

於當時北洋政府的袁世凱而言，卻是拉攏列強的時機，目的是為了他稱帝時所需的借款能夠達成。1931年（民國20年）的「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進一步實行侵略中國的計畫，1932年（民國21年）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在一次的緊逼中國，終於在1937年（民國26年）發動的蘆溝橋「七七事變」，發動全面的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中國也做出反應決定奮戰到底，進入所謂的抗戰時期。

1937年的「七七事變」，中日正式開戰之後，民族主義的教育似乎成了一切教育的主軸。在體育教育方面更是如此，以體訓合一的教育為主，體育教育仍舊施行，另外加強童子軍教育在中學的教育之中，以訓練出如德國、義大利、蘇聯及日本等國的青年團體，目的在為國家盡一己之力，但是事實上多是為了統治者而服務，面臨國家存亡階段，中國方面也再1938年（民國27年）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⁵⁴訓練出1.信仰三民主義；2.擁護國民政府；3.服從最高領袖；4.復興中華民族；5.打倒日本軍閥的青年，而教育方式是透過中國童子軍、學校的軍訓課程及三民主義青年團來進行教育，並舉辦以體育活動為主的夏令營，並鼓勵青年從軍，而這種以民族復興運動為號召的運動起先是1934年（民國23年）蔣介石在江西南昌發起所謂的「新生活運動」，注重「禮義廉恥」四個綱目，要求國民生活的藝術化，培養高尚的水準。生產化，使大家富足，軍事化，使國家鞏固。並養成國民生活，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習性，除去國民不合時代、不適環境的習性。使大眾趨向於適合時代與環境的生活。這時候已經在生活上要求全民進行改變，在生活上養成不同的生活態度，直到

⁵⁴ 樊中原，〈抗戰時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大專院校活動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頁22。

1939年（民國28年）更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共同目標為1.國家至上，民族至上。2.軍事第一，勝利第一。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⁵⁵1944（民國33年）年因為日軍逼近湘桂，戰局吃緊，同年10月14日號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青年募兵運動，更是民族主義精神發揮的極致。這時候的體育運動以全民體育化、體育軍事化為號召，因此實施許多軍事化管理的體育教育，以達到全民文武合一的目標，最後更將軍訓觀念融合在體育教育之中。這些的措施無非是為了「強種保國」，因此在1941年（民國30年）的國民體育法頒布，其內容為「國民體育之實施，應依據中華民國教育宗旨為實施方針，以鍛鍊國民強健體格，培養民族正氣，達到全國國民具有自衛衛國之能力為目的」。⁵⁶從國民體育法的頒佈看出，這時候中國的體育目標不僅在於強身健體，更重要的是達到「自衛衛國」的目的，由此看出這時候的體育主要是為了政治而服務，這也影響到後來體育政策的制訂。

近代中國在接觸西方思想與制度之後，對於體育教育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制度建立，其原因是中國傳統教育中，一直不重視身體的訓練，雖然有傳統的武術但一般的士人對於科舉中的武舉⁵⁷十分看不起，都認為武術只能在身體上做文章，或純為打仗用的工具，直到清末因列強入侵的因素導致清朝政府開始正視中國傳統武力已經無法對抗外敵，就連本身內部的內亂如太平天國、捻亂 等等，都無法應付，在見到洋人的船堅炮利之後，決心施行自強運動設立新式學堂教導西方關於軍事、航海等方面的知識，在軍隊上也開始訓練新式軍隊，在訓練軍隊實施行的軍事體操成為後來在學校教育中體育教育的

⁵⁵ 近代中國季刊編輯委員會，史料選輯，《近代中國》第5期，1978年，頁94。

⁵⁶ 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總統蔣公體育訓詞，1975年，頁113。

重點，目的是使中國的學生能夠重新認識自身的身體之外，更要能學習效忠於國家，這在中國是很難形成的觀念，最主要是因為中國長期以來的專制統治，使得一般人民對於國家大事大多漠不關心，產生在面對外敵時無法凝聚一定的力量以茲對抗，中國政府直到近代面臨接二連三的外強入侵時才逐漸有了關心國家事務的心態，這從李孝悌的著作中可窺知一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民眾逐漸在知識普及下（報業的發展），碰觸到新知識之外，也理解與同情國家的困境，在接受新式教育下，不免在知識份子的主導下，不停的變化，從甲午戰後的學習日本，到後來新文化運動的推翻傳統，以致於五四運動之後追求西方的科學民主，在在地使中國的制度在這種思想轉變之下也不停的變化。

直到1929年（民國18年）之後，中國進入新的統一階段，由國民黨所主導的政權，也開始影響知識的傳播，在1929年（民國18年）公佈教育宗旨，其中的教育理念，在曾瑞成的文章中提到這個教育理念深受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建國理念所影響，隨著政局的演變，救國建國似乎成為當時候唯一目標，從體育政策上來看，1929年制訂的國民體育法仍追求均衡的發展，但是到1941年（民國30年），重新修訂的國民體育法就成為以自衛衛國為目標，學校的體育課程演變，也從前面提及的從自然主義教學演變與傳統武術結合，最後更在對日抗戰的背景，加強軍事教育，希望達到自衛衛國的效果。

在1929年頒佈的「國民體育法」經過1932年（民國21年）的修訂之後，公布「國民體育實施方案」，成為當時國家施行體育政策的根

⁵⁷ 武舉創於702年（武后長安2年），於1901年（光緒27年）廢除。

本大法，但隨著日本入侵的腳步日近，在1939年（民國28年）及1940年（民國29年）教育部分別召開會議，希望透過修改體育政策的施行方針，達到復興民族的目的，並在1941年重新公布修改後之「國民體育法」，其中第一條明訂出國民體育政策在這時期的目標「國民體育之實施，應依據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鍛鍊國民漸強體格，培養民族正氣，達到全國國民具有自衛衛國之能力為目的。」⁵⁸1945年（民國34年）抗戰勝利之後行政院核准以「國民體育法」及「國民體育實施方針」作為準則訂定的「國民體育實施計畫」，從隔年開始，5年為期針對學校體育、社會體育、師資訓練和體育行政四部分進行發展，但是後因政府遷台實施成效不彰。

1947年（民國36年）公布 中華民國憲法 中，第13章基本國策第5節教育文化，條文第158條規定：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知能。⁵⁹希望在行憲之後國民都能達到健全人格發展，並且有強健的體魄，依曾瑞成分析，認為這時期的政策訂定與執行多為為國家服務的工具性取向，這種情形一直影響到國民黨政權遷台，到解嚴之後才因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才有逐漸獨力發展的空間。⁶⁰

⁵⁸ 1941年9月9日國民政府公佈，《台灣省教育發展史料彙編（上）》，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台中圖書館，1988年，頁65。

⁵⁹ http://www.gio.gov.tw/info/index_c.html，行政院新聞局網站。

⁶⁰ 曾瑞成，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文，1999年，頁26-27。

第四章 1945年後台灣地區體育政策與棒球發展

戰時台灣因為身為日本的殖民子國之一，因此也成為日本戰爭時生產戰需品的重要補給戰，也因如此盟軍對於台灣進行轟炸，使得台灣在日治時期的重要工業廠所都受到嚴重的摧毀，人民的生活也因為要參與戰爭而陷入困頓，在這樣的情形下，棒球運動也就無法在台灣繼續進行，直到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台灣為國民政府接收，進入了另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一個真正屬於台灣人參與棒球的階段，相較於以往都是統治階級的日本人可以參與的運動，現在卻成為台灣人民主導的活動，以下將介紹戰後1945年後，台灣棒球運動發展的情形，以及它和體育政策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戰後初期體育發展及台灣棒球：

1945年（民國34年）10月25日由國民黨派員來台接收之後，稱這一天為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時，由於當時政治、經濟尚未穩定，在中國大陸與台灣仍舊一片戰後的欣喜，因此為了慶祝光復週年，在1946年（民國35年）的光復節前後，舉行了第一屆的省運，其中包括許多運動項目，如田徑及球類運動等項目，而球類運動中包含一項從日治時期就已經留下的——棒球。由於當時台灣仍處於戰後物資缺乏的年代，加上在國民政府派員接收之後發生貪污、與接收不當的情形，引發了台灣島內的通貨膨脹民生更加困苦，造成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即是因為在物資短缺的狀態下，台灣人民鋌而走險販賣走私香菸，經由查緝人員發現，欲予以沒收遭到反抗而導致衝突事

件發生，在這之前台灣人民與大陸來台的官民，因為經過五十年的隔閡，已在文化上及生活上顯現出差異，而在政策失當的狀態下，更加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因而產生國民黨政權利用軍隊鎮壓才平息這場「亂事」，但是棒球運動似乎不受影響，在隔年（1948年）的5月，台灣派代表隊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全國運動會，台灣代表隊獲得棒球項目的冠軍，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這也是在說明派遣台灣選手參加全國運動會，目的在向大陸方面表示台灣並未因為「二二八事件」反對執政者，以此作為宣示。從了省運維持每年舉行一次外，其他如「協會盃」也在1948年開始舉行，根據《台灣棒球一百年》所引用資料顯示，這項賽事在第四屆（1952年）時因為美國方面已經進入台灣進行美援（1950年~1965年），在第四屆協會盃時恭逢其盛，由美軍顧問團贈送金像獎盃一座，因此，「協會盃」又稱之為「金像獎盃」，另外在1948年，台北新公園棒球場附近，由就近的合作金庫、華南銀行、彰化銀行、土地銀行、台灣銀行、第一銀行組成的銀行公會比賽，也帶起另一股風潮，當時的球員許多是日治時期的有名選手，但是由於台灣物資缺乏，使用的球具主要是日治時期留下的器材，在球的使用上採取的是較為省錢的軟式棒球，而球棒則是台灣人自製的木頭球棒，在品質上當然比不上戰後經由美國快速扶持成長，並且原先已有近70多年棒球發展歷史的日本，儘管如此這項賽事仍帶動台北地區民眾觀看球賽的熱潮，直到1965年，由於參加隊伍逐漸減少，只剩下老牌子的合作金庫為止就不再舉辦了，這段時期稱之為「六行庫」時期。

61

雖然台灣棒球運動在戰後初期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而台灣的體

⁶¹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頁123。

育發展，卻停留在原地，由於接收單位的特殊，台灣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鎮壓之後，才改行省制，使得台灣在戰後初期的行政管理，出現了短暫的空缺，體育發展上更是遑論，因為經濟與政治的不穩定，教育事業無法立即發揮，直到1949年政府遷台之後，才積極的重視台灣「復興基地」的建設，體育政策上才有所制訂。但是整體體育發展和棒球運動，僅維持在舉辦賽事和參與賽事之間，未有政策主導運動發展的關係。

第二節 政府遷台後體育政策制定與台灣棒球

（一）遷台初期體育政策與棒球運動

1949年政府遷台之後，因為有著對岸的威脅，以及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不穩定因素所致，在政治上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且在1950年（民國39年）實施戒嚴，目的為使國民黨政權穩固，擴大了總統的職權與連選得連任制度，民意代表也以大陸時期的中央民意代表為主，再以逐年增額補選的方式遞補缺額，這也明顯的加強了從在野地位重新復出的蔣家勢力的再度建立與鞏固，這時期台灣民眾由於受到「白色恐怖」⁶²的壓迫，無奈的在教育上只好跟循著所謂表面上的三民主義教條下的教育，目的在培植台灣人民的思想，避免受到共產勢力的洗腦，在戰後台灣資訊封閉的狀態，以及韓戰時期美國的經濟、軍事援助，帶給這時期不穩定台灣情勢，一種平穩的力量，加上國民黨政權努力經營土地改革，希望先掌控令他們害怕的農民勢

⁶² 所指的是1949—1950年代國民黨在大陸戰敗之後撤退來台，為鞏固在台政治勢力，防範共產勢力的入侵，對於可能危及其政權者的濫殺與濫捕的壓迫情形，稱之為「白色恐怖」。

力，以及利用偵察、恐怖、間諜的宣傳，製造台灣人民的危機感，並一再宣示，將率領台灣人民「反攻大陸」，目的在控制台灣人民的思想、維持從大陸遷台外省移民的忠誠，及要脅美國成為美援的代價，在這樣的口號下，台灣人民為了自保，只好接受國民黨政權所給予的教育，以「反共抗俄」作為主軸，在1952年10月（民國41年）根據第7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 中國國民黨政綱 關於教育規定上，增強三民主義教育，以及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實施軍訓教育，並且從大眾傳播宣導反共抗俄理念，⁶³ 試圖利用這些傳播媒介來控制人民的思想，而這些執政黨的策略成為教育部實施教育政策的綱要，在歷年的行政院施政計畫中實施。⁶⁴

自民國4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在各師範院校試辦軍事訓練，民國41學年度開始在全省大專院校畢業生實施預備軍官訓練，民國42學年度在高級中學實施軍事訓練，師範學校與高中畢業為考取大學者則受四個月軍事訓練，民國43學年度則在全省專科以上學校實施軍事訓練，在在的顯示國民黨政權的憂心。而這種取向的教育政策，也影響到體育政策，體育是在德、智、群三育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環，而體育的目標在於加強身體機能、發展運動能力、發展群性、發展心智能力，⁶⁵為了貫徹復國建國的理想，在體育政策上其具體目標為，1.奉行三民主義，加強反共復國意識；2.發揚民族精神，恢復我國固有道德；3.注重勞動生產，養成勤勞儉樸的習慣；4.配合軍事需要，訓練各種實用技能，並且在1952年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其成立主旨在於：

利用白色來顯現當局的保守與反反動的心態。http://www.jimlee.idv.tw/art_01_13.htm。

⁶³ 曾瑞成，〈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頁38-39。

⁶⁴ 分別在1950、1952、1953、1966、1968年的施政計畫中實施。同上註，頁39-41。

⁶⁵ 同上註，頁123。

「在團結全國優秀青年，增進其智能，鍛鍊其體格，訓練其工作技術，培養其愛國精神，從事各種戰時工作，以爭取反共抗俄之勝利，達成復國建國之任務」。⁶⁶配合著體育活動的舉辦，於1958年增設暑期青年戰鬥訓練，內設有國防體育隊，舉辦各項運動如體操、田徑、舞蹈、棒球、拳擊、舉重、摔角、擊劍等，但是這些體育活動都蘊含著反共抗俄、復國建國的思想在其中，這主要是1950年代體育政策及其主要意涵，這時期因為沒有專職的體育主管機關，一直到了1954年教育部才重新設置國民體育委員會，但到了1958年因為經費不足，無法發揮這機構的效能，因此又撤銷，直到1961年國民體育委員會復會，並積極安排體育司的建立，政府單位才有了專職的機關，因此對於體育政策並未有完整的規劃，僅配合軍事與政治需要，加強國民身體的鍛鍊。

但是在棒球運動上，確有著與體育政策大相逕庭的發展，除了前面提到的「協會盃」及六行庫的比賽之外，原先在台灣光復時成立的台灣體育協會（延襲日本舊有）的棒球協會，在1949年由當時但任教育廳副廳長的謝東閔先生改名為中華全國棒球委員會（1973年改名為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至今），配合台灣體育會一起成立，謝東閔先生成為首任主任委員，莊加恩先生為總幹事，謝國城先生為常務委員。⁶⁷對內舉辦賽事如台北銀行團的比賽（也就是六行庫）、「協會盃」、對外也邀請國外球隊前來台灣進行友誼賽，如在1953年（民國42年）來台訪問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棒球隊，當時候早大正面臨球隊青黃不接的階段實力不強，而早大來台訪問將與美軍、銀行公會隊、台灣聯隊、台

⁶⁶ 同上註，頁129。

⁶⁷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頁126。

南大涼隊等對戰，⁶⁸這個時期台灣的棒球選手沒有機會與國外的選手比賽，所以不瞭解其他國家選手的情形為何，遇到的早稻田大學棒球隊應該可輕鬆應對，但是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早稻田來台更進行了11場對戰，卻以10勝1敗的戰績明顯勝出，早大隨隊教練對於台灣球隊的表現感到驚訝，為何當初曾經出現在甲子園轟動一時嘉農棒球隊發源地的台灣，如今的棒球水準有不進反退的現象，歸咎於此，主要是台灣棒球，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棒球運動因戰事而暫停（原先還有全台灣的高校聯賽，為的是選出台灣代表隊，詳見第二章），在日本戰敗之後，台灣棒球運動雖在民間愛好者，與棒球協會的支持才繼續有小型賽事舉行，但是觀念與技術在沒有日本人的指導下，有逐漸退步的現象，加上台灣的球具發展並沒有比日本來的進步，台灣球員使用的是舊的觀念與不純熟的技術，加上不良的球具、場地 等等種種因素下，無法突破自然就容易輸球，但是棒球協會仍繼續邀請國外球隊前來台灣，如明治大學、慶應大學、日本讀賣巨人隊 等等球隊來台訪問並進行比賽，這些多多少少都增加了台灣的棒球經驗。

1955年（民國44年）謝國城先生從華南銀行接手棒委會總幹事，根據簡永昌先生記載，移交之後，棒委會只剩下新台幣57元，當時台灣運動設備非常落後，許多關於棒球的用具都是經由日本輸入，而棒球設備又是極為昂貴的消耗品，因此對於1950年代仍多是農業的台灣社會來說，推行棒球運動實在十分困難，但是仍有民間自行舉辦的賽事，從1956年開始，在中部地區有所謂的「民聲盃」，這個比賽是由當時台中地區的地方性報紙民聲日報所主辦，這項比賽也和銀行盃一樣採用較為便宜的軟式棒球，對於物資缺乏的台灣不失為便宜行事之

⁶⁸ 同上註，頁93。

計，除了這些賽事之外，還有後來的中華盃（由中華日報舉辦）、國軍棒球賽、主席盃 等等賽事的舉辦。⁶⁹雖然在當時已有許多盃賽的舉行，但是台灣整體的棒球水準在日治之後並未有所進展，主要的原因在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棒球參與者仍舊以日本人為主，台灣人雖然有參加但是可說是少數中的少數，而這些盃賽的舉辦充其量只能說是各地方對於棒球有興趣者，在買的起球具的狀態下（有可能是自購或是合購），組成球隊參加比賽，可說是友誼性質的比賽，再加上真正實力好的選手仍是少數，從許多盃賽可以看到重複的身影出現得知，如下文將提到的亞洲盃，棒球運動在戰後的發展仍是舉步維艱，但是從這裡看出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比賽的舉行多半是透國民間自行籌措經費，政府方面無力也無心進行補助，就當時的政治背景而言，國民政府積極對於對岸的威脅進行部署，1950年開始的韓戰，使得美國對於台灣進行經濟、軍事援助，暫時平穩了台灣的危機，而在這種緊張之餘，國民黨政府鼓舞士氣的發誓除了一再地宣揚「反攻大陸」的口號之外，對於外省土官兵民的娛樂則以在大陸較為流行的籃球與足球，作為補助的主軸，對於棒球只知道是台灣民眾流行的運動，除了在救國團暑期戰鬥營中的運動項目中包含之外，稱不上有實質的補助與獎勵的行為出現，所以有人說出「外省人打籃球、台灣人打棒球」⁷⁰的說法來體現這樣的現象，明顯的表示當時台灣的棒球運動可說是與官方幾乎毫無關係，這時期政府可說是完全沒有針對棒球發展的政策可言，一切都依靠民間團體，尤其是中華棒球委員會的推動進行，這也明顯顯示台灣棒球未受到政治力介入。

⁶⁹ 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頁59。

⁷⁰ 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頁74-76。

但既使台灣棒球界在如此窘境，仍打算先以學習日本為主（主要是訓練方式）。1954年（民國43年）棒委會答應菲律賓方面的邀請，與日本、韓國組成亞洲棒球聯盟，並在同年12月舉辦首屆亞洲盃成棒賽，台灣棒球委員會希望透過這樣的國際賽事，增加台灣選手與國外選手對戰的機會，藉以推廣台灣的棒球運動，菲律賓方面更是請我國在隔年主辦第二屆亞洲盃，當時我國棒球水準不及日、韓、菲三國，比賽結果都不出意料之外的經常墊底，但是卻未打消台灣想自己主辦亞洲盃的想法，但是說到要主辦亞洲盃，在40年代的台灣，因為沒有合適的場地與足夠的經費只好回絕，直到1957年台北市立棒球場的興建，台灣才正式擁有第一座規模完整的棒球場（尺寸仍不符合國際標準，如中外野全壘打牆至少要距離本壘400英尺，但是台北球場只有360英尺，左右外野各為310英尺），這得要拜亞洲盃之賜台灣才有機會興建。

而在前文提到許多的盃賽，都是棒球委員會本身為了因應參加亞洲盃所舉辦的，如北區春季大專棒賽、全省學童棒賽、全省中上學校棒賽、主席杯棒賽、協會杯棒賽與秋季大專棒賽等六項，加上由中華日報主辦的中華杯、民聲日報每年在中部舉辦的民聲杯、台南市舉辦的成功杯，希望加強我國棒球的實力，並且從這些比賽中，選出合適人選組成所謂的「台灣聯隊」，成為對外比賽的代表隊，這支球隊在1954年的亞洲盃，正名為「中華民國代表隊」，成為台灣首支的國家代表隊，被選中的選手相對的也被稱之為「國手」，這個背景是因為參加亞洲盃的代表隊，都是以國家命名，因此國民政府只好對於台灣聯隊加以正名，許多好選手的實力也從口耳相傳的不科學方式選拔，演變為透過實際比賽選出，因此只要成為台灣聯隊或是中華民國代表隊的選手，

可說是當時台灣一等一的好手是無庸置疑的。⁷¹亞洲盃不僅為台灣棒球的國家選秀制度催生（之前就是透過所謂的口耳相傳），也在後來影響棒球運動的推展，更重要的是台灣棒球在亞洲盃之後，逐漸踏入國際舞台，之後更參加洲際盃（1973年首度參加）世界盃（1972年首度參加）等等賽事，這對於我國棒球發展無疑的是一項好消息。

表1 我國參加六屆亞洲盃成績表

| 年度 | 1954 | 1955 | 1959 | 1962 | 1963 | 1965 |
|-------|------|------|------|------|------|------|
| 冠軍隊 | 菲律賓 | 日本 | 日本 | 日本 | 韓國 | 日本 |
| 中華隊名次 | 第四名 | 第二名 | 第三名 | 第二名 | 第二名 | 第三名 |

資料來源：高正源，《東昇的旭日》，頁252-255。

（二）棒球驚奇與體育培訓的初步結合：

延續前一期的發展，台灣民眾在國民政府的加強教育下，已逐漸受到三民主義教育的影響，也建立起對於國家民族，甚至相信由政府提出「反共復國」的口號，儘管教育如此發展，成為教育一環的體育教育，有了不同的轉變，由原先的軍事用途，轉變為體育人才的培訓、體育師資的汰換提昇、體育設備的加強建設 等等面向發展，我們看到在1962年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雖然主軸仍以「培養國民健全體格，以為復國建國之用」，⁷²針對這時期體育設備缺乏、師資良莠不齊、

⁷¹ 同上註，頁66-68。

⁷² 同上註，頁133。

體育經費分配不當等等問題加以探討。1964年公佈教育修正大專、中學、國校（實施九年國教前國小稱國校）體育實施方案，這時體育課程內容，仍以教育化、軍事化導向為主軸。

表2 學校體育實施方案分析

| 學校階段 目標 特質 | | 小學 | 中等學校 | 大專學校 |
|------------------|---------|-------------------|-------------------|---------------------|
| | | 政策屬性 | | |
| 教育化 導向 | 身體的發育 | 強健的體魄 | 鍛鍊體格 | 鍛鍊體格 |
| | 規範的行為 | 團體生活的基礎 | 公民道德、團體合作之精神 | 公民道德、民族精神 |
| | 運動的技能 | 運用身體的基本能力與方法 | 運動技能、生活技能 | 生活技能 |
| | 保健的態度 | 保健的知識與習慣 | 運動習慣 | 運動習慣、調節身心 |
| | 康樂的生活 | 康樂的生活 | 康樂的生活 | 正當娛樂 |
| 軍事化 導向 | 國防的特殊目標 | 勇敢、冒險、堅忍與奮鬥等精神 | 安全自衛之能力 | 國防技能 |
| | 政策來源 | 國民學校體育實施方案（1964年） | 中等學校體育實施方案（1964年） | 專科以上學校體育實施方案（1964年） |

資料來源：曾瑞城，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頁137。

但是到了1966年，教育部為加強學校體育的實施，訂定 各公私

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保送升學辦法 分定十等級的保送方法，之後在1968年增加國中畢業生保送高中或五專，也使得台灣體育政策的競技性取向增加。前面提到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在1952年成立之後，也成為沒有專職體育關做單位之下，另一個推廣體育的單位，1964年救國團更成立體育推行委員會，下設有十四項單項委員會，如籃球、排球、棒球、水上運動、國術、田徑、足球、桌球、國防體育、體操等均設有委員會，聘請各種專業運動人是推廣體育，1965年公佈推行青年體育運動實施辦法，旨在普及社會體育活動，並且培養體育優秀人才。1968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使得初等教育延長至國中階段，也解決許多惡性補習的情形，體育發展較不受升學主義的影響，而有相對的發揮空間，1970年教育部公佈新的各級學校體育實施方案，除了教育性與軍事性導向仍存在，也加入了人才培訓的競技性導向政策。（見表3）。

表3 1970年各級學校體育實施方案

| 政策性質 | 學校階段 | 國民小學 | 國民中學 |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
|-------|-------|------------|-----------|-----------|
| | 目標特性 | | | |
| 教育化導向 | 身體的發展 | 健全之身心、均衡發展 | 鍛鍊身心、均衡發展 | 鍛鍊體格 |
| | 規範的行為 | 團體活動之基礎 | 運動道德、國民德性 | 公民道德、民族精神 |
| | 保健的態度 | 愛好運動 | 運動習慣 | 運動習慣 |
| | 康樂的生活 | 康樂生活 | 康樂生活 | |
| 競技化導向 | 運動的技能 | 運動能力 | 運動技能 | 運動技能 |
| 軍事化 | 國防的目標 | 服從、互助、合 | 安全與自衛 | 安全與自衛 |

| | | | | |
|----|------|---------------------------|--------------------------------|--|
| 導向 | | 群、安全知能 | 知能力 | 知能力 |
| | 政策來源 | 國民小學體育 實施方案 (1970年) | 國民中學 體育實施方 案 (1970 年) | 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體 育實施方 案 (1970 年) |

資料來源：曾瑞城，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頁151。

1971年我國退出聯合國，中共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頓時壓縮我國國際上空間，為了突破這樣的困境，體育外交成了拓展外交版圖的途徑之一，台灣省教育廳頒訂 台灣省公私立中等學校體育班設置計畫 增加體育人才培訓工作。其實在中央主導國家政策制訂之下，台灣省政府與中央差異性不大，也在提升師資、充實教育場所與器材，並自民1952年舉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會，選拔優秀選手，1965年更制訂獎勵推行體育成績優良學校，如1968年的紅葉國小，1970年開始在金龍少棒獲得世界冠軍之後，舉辦全省國民中學棒球賽，以提高棒球水準，這些可以看出省府負責以國中、小學為主，且為避免影響這段時期學童發展，政策多半偏向教育性導向。⁷³

而政府之所以會對於棒球運動予以補助，甚至舉辦全省性的選拔賽，這都與紅葉和金龍少棒隊，帶給台灣民眾的希望與驚奇有關，事實上，就在前面提到自1954年，在亞洲盃成棒賽帶起的風潮下，台灣棒球也慢慢的在成長當中，以1968年（民國57年）台東紅葉少棒隊為例，她是台灣棒球充滿驚奇的開始，這支來自台東的少年棒球隊 - 紅葉隊，在第20屆全省學童杯棒球賽中擊敗嘉義勁旅 - 垂揚少棒隊奪得

⁷³ 同上註，頁157。

冠軍（主要是因為這時候嘉義地區由於嘉農棒球隊的影響，在當地的民眾都稱他們是台灣棒球的發源地，⁷⁴而垂揚隊是當時少棒球隊中的超強勁旅），接著在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總幹事謝國城先生的奔走之下，力邀剛剛贏得1968年世界少棒冠軍的日本和歌山少棒隊來台作表演賽，兩戰均擊敗日本和歌山少棒隊（其他台灣的少棒隊紛紛落敗），掀起台灣棒球的風潮。以下介紹他們成功的歷程。

紅葉少棒隊來自台東縣紅葉村紅葉國小，學校平均人數在當時約150人左右，在當時原住民小學的學生因為家中貧困，所以必須在家幫忙農作，因此學生到課率很低，於是校長林珠鵬先生在1963年（民國52年）8月1日到任之後，為了使學童不致於荒廢學業，在無計可施的情形下，希望透過教導學生玩棒球並組成球隊來吸引擁有運動天分的原住民學生前來學校上課，但是在山區部落的小學不像一般城市的學校經費充裕（每個月只有教育部發給的經費九百元），對於購買球具的問題只好一段時間一支球棒、一個手套的購買，如記載「球隊組成後，因一時沒有經費，球棒只能一支一支的買，手套也是一個一個慢慢添」。⁷⁵這時候校長配合畢業於台東師範學校的邱慶成老師，一起來教導學童棒球。為了盡心練習，邱教練只好教學生利用竹竿當球棒，皮球當球作基本的投球與打擊練習「從五十二年開始，由於學校經費困難 只好買二塊錢一隻的皮球，讓學童們用截短的竹桿來打」，⁷⁶並利用輪胎綁在樹腰上，練習揮棒的力道，一次次家買來的棒球用線一再地縫補 等等最節省經費的方式，同時也是最辛苦的方式

⁷⁴ 蘇錦章，《嘉義棒球史話》，台北，聯經出版社，1996年。

⁷⁵ 資料來源張敬果等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台北，九鼎出版社，1983年。

⁷⁶ 《青年戰士報》，1968年7月30日。

來訓練學童。

成軍之後的隔年，紅葉隊開始發揮他們苦練的成果，先是在1964年（民國53年）獲得台東縣縣長盃少年棒球賽冠軍（並連續衛冕四次冠軍），接著在1965年5月間，出兵第17屆全省學童盃獲得第四名，1966年又獲得18屆全省學童盃冠軍、19屆全省學童盃亞軍，終於在1968年（民國57年）獲得秋茂盃冠軍與第20屆全省學童盃冠軍後，開始受到國內媒體的注目，並且紛紛報導他們辛苦成名的過程，更有人願意安排他們出國前往菲律賓參加比賽，⁷⁷而電影公司因為他們的故事十分具有吸引力，更決定以紅葉隊成員、教練、校長作為演員直接拍攝成影片，在五月份比賽結束之後，有三家電影公司相繼與紅葉隊及其相關人員談論拍片事宜，卻因為業餘運動員不得參與商業行為，他們卻不顧這項規定，逕自參與電影拍攝，導致撻伐聲四起；另外就是「槍手」（冒名頂替）一案，有一段報導「本月十五日（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台南市民周金龍、邱添寶等二十一人，聯名檢舉紅葉隊及垂揚隊有冒名頂替情事『查獲全省冠軍之紅葉隊，於本年三月間參加第一屆秋茂杯學童棒球賽時，曾僱用新港初中二年級學生古振仁冒充古仁義為捕手，當場被大會認出以徐合源名義參加秋茂杯之一壘手。同一人竟以古進財名義參加全省第二十屆學童棒球賽一壘手』」，⁷⁸使得紅葉隊在成名風光之後，卻也招致大眾以放大鏡來檢視他們的言行。⁷⁹

⁷⁷ 由當時紅葉成員之一胡明澄先生口述，記錄者溫勝智，2003年11月整理稿。胡明澄先生現職台中市環保署清潔員。

⁷⁸ 《民聲日報》，1968年6月28日。

⁷⁹ 經胡明澄先生口述，確有其事，主因是他們畢業之後球隊人數不足，因此前往替補。

這時許多的報導仍以正面角度看待，如中央日報報導，標題為「以關心代替打擊 - 談紅葉棒隊的『風波』」⁸⁰就是希望在國內體育風氣低迷情形下，紅葉故事是提昇整個體育環境的好範例，即使真的有冒名頂替，也不需過分苛責。也有利用紅葉故事希望成人棒球跟著學習「一樹『紅葉』 心血澆成！多少艱辛、多少淚 才有這支棒球隊。如何摹仿、如何做 大人應跟孩子學」，副標題「掀起球運 有待革新」⁸¹內容說明從小孩子做起，建立台灣棒球風氣，種種的報導就是希望大眾不要過分苛責，導致學童對於打球的興趣因而削減，國內對於棒球運動的關注因而減弱，最主要希望紛爭趕緊平息，這樣紅葉隊才有辦法參加在1968年8月舉行的中日少棒友誼賽。

1968年8月24日，終於到了中日邀請賽，日本隊共出戰三場比賽，分別對抗嘉義垂揚隊、台東紅葉隊與中華聯隊在台北市立棒球場⁸²舉行。這三場比賽下來，最後的只有台東紅葉獲得勝利，這對於當時棒球環境相差甚大的兩國而言，除了代表著台灣有進軍世界的的能力，也表示台灣棒球的路徑也自此與日本分離，呈現出不同的風貌，畢竟從日治時期學習日本棒球的訓練方式，以及他們對於棒球的觀念，深深的影響著當時的台灣人民，並且認為台灣棒球不如日本的觀念，也因打敗日本代表隊有了不同的看法。之後紅葉隊的好表現暫時的掩蓋了之前的傳聞，「蔣主席慰勉紅葉隊，用功讀書力求上進。省府撥款十萬元充實紅葉國校體育設備。各界捐獎學金盼社會共襄盛舉」⁸³這是在比賽結束後的立即報導，這些可能觸犯法律邊緣的小選手及他

⁸⁰ 《中央日報》，1968年6月19日。

⁸¹ 《徵信新聞》，1968年5月23日。

⁸² 台北市立棒球場建於1957年，於1975年加裝夜間照明設備，台灣才有了第一座可舉行夜間球賽的賽場，2001年1月18日因設備老舊拆除。

們的教練、老師們，一下子成為打敗日本隊的英雄，受到了當時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主席 - 蔣經國的接見，鼓勵他們用功讀書，並贈送他們一人一套球衣。這時省府也立即做出反應，撥款10萬元充實紅葉國小的體育設施，而相較於對紅葉慷慨，只撥2千元給予學童杯亞軍的嘉義垂揚隊，但對於體育發展整體而言，也算是不無小補。另外紅葉隊的球員中有4名即將升學(古進財、賴金木、王志仁、胡武漢⁸⁴)，各界也開始捐獻獎助學金，希望多少有所幫助。對日的表演賽結束之後，紅葉隊一行回到台東，更受到如8年前(民國49年)楊傳廣獲得奧運十項運動銀牌來歸時的盛大場面。⁸⁵

但隨著主力球員紛紛畢業，紅葉隊有如曇花一現地，無法繼續有好的發展，這也顯示出當時實際環境的不佳，使得球員無法接續，這一代的球員有好的表現，下一代球員不一定能銜接。經過一年風光的紅葉，當年冒名頂替風波再起進入訴訟，主因在於偽造文書「台東紅葉國校組成紅葉少年棒球隊，於五十六年四月間 參加再屏東舉行的全省第十九屆棒球比賽，該隊教練邱慶成與胡學禮決定以超齡學童江萬行冒代胡武漢參加」⁸⁶「五十七年一月中旬 參加『秋茂杯』胡學禮與邱慶成又決定以江萬行冒代胡武漢、江紅輝冒代胡勇輝參加。」⁸⁷「五十七年四月 參加台灣省第二十屆學童棒球賽，胡學禮與邱慶成 決定以江萬行冒代胡武漢、江紅輝冒代胡勇輝、邱德聖冒代王志仁、胡明澄冒代胡仙洲、余右任冒代胡福隆、徐合源冒代古進財、江元興冒代余進功及胡仙洲冒代陳進財(以上冒代人或已在該

⁸³ 《中央日報》，1968年8月27日。

⁸⁴ 當時紅葉隊主力投手，本名江萬行。

⁸⁵ 《中央日報》，1968年9月3日。

⁸⁶ 《中央日報》，1969年9月9日。

校畢業或為超逾規定年齡)」，⁸⁸而在同一份報導當中，記者訪問胡學禮，他卻表示1.他不知道用冒替學生比賽是違法的。2.冒替學生多是正式球員的學長，在球員受傷時他們願意代替出賽。3.同時其比賽許多隊伍也有冒替現象並未違法，頂多以取消比賽資格了事。他們以偽造文書罪被判刑，此時各界提出關懷「最高檢察署決依法救濟。教廳無意加以行政處分」，⁸⁹希望法院能從輕量刑，認為他們的行為是為了求取好成績並無惡意，這個事件在1969年年9月13日判決確立，涉案的胡學禮、邱慶成及球隊管理曾鎮東判徒刑1年、緩刑2年。

紅葉隊，這支以極少經費、極精簡的人員，秉著追求勝利的單純信念，從1964年開始出賽，到1968年擊敗世界少棒冠軍的日本和歌山少棒隊，給予當時台灣沈寂的體育界，打下一劑強心針，紅葉精神也隨著在之後大量成立的球隊中，繼續的傳承下去，因為紅葉的例子使他們相信只要肯努力，即使再困苦的環境都能有好表現，這隊於物資較為充裕的台灣西部學校而言，無疑不是一種鼓舞，這也引起接下來中華棒球委員會決心從少棒培養台灣棒球開始向下紮根。但是政府方面由於沒有一個獎勵方式，因此，對於紅葉少棒的好表現就呈現以不同單位，給予不同金額給予資助，似乎想表現出政府有注意到棒球發展的假象，但是也從這裡可以看出，政府對於體育活動，除了在前一章政策第一期所提到的，注重軍事教育的體育訓練為主要目標外，其實這個時期的台灣並未有一個完全的體育教育制度建立，一切都是因應需要所做的調整，對於棒球運動，在一開始是不補助的狀態，民間自行辦理一切事務，到現在紅葉的好表現之後，才重視到棒球似乎在

⁸⁷ 同上註。

⁸⁸ 同上註。

台灣已經有點規模，但是政府相關單位並未有針對棒球運動制訂的政策產生，到紅葉為止，政府對於棒球仍舊處於單純的鼓勵，沒有實質的政策。

⁸⁹ 《中央日報》，1969年9月10日。

圖5 紅葉棒球隊奪得全省學童杯冠軍



圖6 紅葉少棒隊對日之戰

圖7 紅葉少棒隊勝利之後的饗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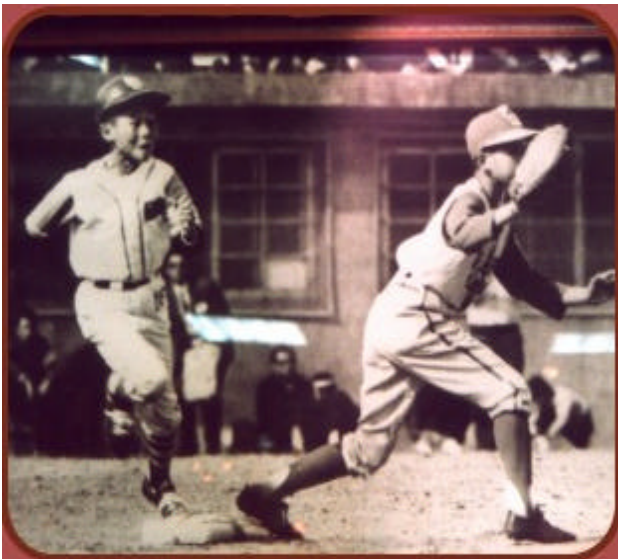


圖5、6、7 資料來源：<http://089.ez-go.net/page/shop/redleave/r1.htm>

就在紅葉隊打敗日本和歌山隊之後，日本隊的教練吉倉利夫先生，以他們參加世界少棒聯盟的經驗告訴棒球委員會，認為我們有實力可以參加世界少棒聯盟所舉辦的比賽，為了參加這項賽事，必須有個專門的主辦單位，於是中華民國少棒聯盟因應而生（1969年），並正式加入美國威廉波特的世界少棒聯盟。⁹⁰根據世界少棒聯盟規定，比賽必須使用硬式棒球，而當時台灣本土比賽都是使用軟式棒球。中華全國棒球委員會在1969年（民國58年）為了參加此項國際賽事，正式舉辦第一屆全國少年棒球錦標賽，且在台灣的棒委會也根據世界少棒聯盟規定施行分區比賽，但沒有使用硬式棒球來比賽，仍採用軟式，主因是未有硬式球具可使用。於是從2月2日開始舉行東、南、中、北4區比賽，最後由嘉市大同榮獲冠軍，經過這時候棒壇宿將薛永順、張秋欽、陳池榮、高泉榮、林聖銓選拔以嘉義市大同隊9人為班底，加上台東鎮、台南永福、台東紅葉、台中忠孝的球員，組成14人的國家代表隊，準備迎戰日本關西少棒隊。由於中華全國棒球委員會為民間組織，平時除了比賽門票收入外，沒有政府的經費補助，為了節省經費，球員只好分開在原學校自主訓練備戰，準備迎戰4月來台進行友誼賽的日本關西少棒隊，但是卻沒有符合規定的硬式棒球的器材，硬式棒球的器材必須等日本關西隊來台時，順道帶來，可見當時打棒球的辛苦與物資缺乏嚴重，但是為讓球員提早適應，只好使用去年日本關西隊對抗紅葉隊之後留下的硬式器材，直到比賽前一週，各地球員才集中到台北集訓。

⁹⁰ 世界少年棒球聯盟（World Little League Baseball）自1939年成立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威廉波特市起初為美國東部新英格蘭附近的友誼賽，直到了1963年由於加拿大、歐洲、日本、拉丁美洲先後加入聯盟，世界少棒比賽才具有「國際性」。張敬果等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10-12。

終於在4月2日，日本關西少棒隊來台，並且帶來硬式棒球的用具，小選手們經由兩天的訓練，立即於4月5日與關西少棒隊進行兩場友誼賽，因為使用的是硬式器材，小球員們仍不熟悉，結果兩場比賽皆落敗，使得國內棒壇人士大感憂心，於是決定由薛永順、方水泉、簡永昌三位老將環島招募身材為145公分以上、基本動作與打擊都好的選手14名，一起與原先選出的選手（共30名）分為紅白兩隊進行對抗賽，從6月5日開始到6月8日結束，挑選出14名球員，名單如下，投手：郭源治（台東豐年）張瑞欽（台中大同）陳智源（台南立人）陳玉佼（台中忠孝）捕手：蔡松輝（台南玉井）蔡景峰（嘉義大同）內野手：黃正一（嘉義大同，一壘手）陳弘丕（嘉義博愛，二壘手）余宏開（台東紅葉，三壘手）莊凱評（台南永福，遊擊手）溫天壽（嘉義大同，二壘手）。外野手：陳鴻欽（嘉義大同，左外野手）李俊傑（台南立人，中外野手）林建良（臺北老松，右外野手）。⁹¹紛紛來自各個學校，經由棒球委員會安排，前往台中忠孝國小就讀，這支後來稱做「無敵金龍」的金龍少年棒球隊，其實是全國挑選出的明星隊，這也看出當時的棒球委員會，為了讓這些出國的球員是國內頂尖好手組成，而違反了世界少棒聯盟必須由各分區比賽後的冠軍隊伍代表參加的規定。

這支中華隊先是在世界少棒聯盟規定的太平洋分區中與日本、關島代表隊進行比賽，7月26日中華隊對抗關島隊，終場中華以16A：0獲勝。7月28日對抗種子隊日本關東隊，中華仍以3A：0獲勝，取得太平洋區代表權。根據當時中華隊副領隊簡永昌先生的描述「當會長(世

⁹¹ 同上註，頁43。

界少棒聯盟會長)麥高文先生(P. J. McGovern)說:『中華少年棒球隊獲勝,將可參加世界大會。』問山崎(當時世界少棒聯盟太平洋區秘書長)是哪一區?他看名單(為英文地區名)只知道台中,就回答台中隊。他請謝(國城)先生考慮隊名。謝先生即告訴他以『Golden Dragon』(金龍隊)登記,⁹²這就是台中金龍隊隊名的由來,其實也是當時為了求好表現的權宜之策,但是沒想到卻成為後來國人過度重視這項比賽的最初伏筆。

在取得前往美國比賽的遠東區代表權之後,出現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前往美國比賽的經費約需台幣120萬元,不知要從何而來,就如同前面提到的,中華全國棒球委員會(簡稱棒委會)是一個民間組織,經費來源除了舉辦比賽收取的門票之外,就只有靠外界的捐獻,政府並沒有補助,於是棒委會理事長謝國城先生只好四處奔走,首先獲得臺北市政府與台中市議會各10萬元的捐助,接著台灣鈴木機車公司代表王清宗捐出20萬元,但是錢仍不夠,於是謝國城先生又前往美軍顧問團詢問,是否有前往美國的軍機可以讓這些小選手搭乘,當時美軍顧問團團長戚威拉將軍看到這種情形,認為讓小選手搭軍機於法不符,立即向在場的士官兵說明,而募得了美金7,589元,⁹³加上後來各方捐助,勉強湊足120萬元,小選手們才有機會出國比賽。⁹⁴

1969年8月20日,第23屆世界少棒錦標賽在美國賓州威廉波特成舉行,中華隊21日首戰對抗加拿大隊,「熟悉中國隊和加拿大陣容的專家們,看好中國隊。祇要維持他們平常和正常的表現,幾可確定他

⁹² 簡永昌,《棒球與我》,台北,簡永昌發行,1977年,頁7。

⁹³ 《自由中國之工業》第23第4期,1969年10月,頁30-31。當時幣值為美金1元:40.10元台幣,換算約台幣30萬3千多元。

⁹⁴ 簡永昌,《棒球與我》,頁26。

們將勝過他們的對手。」⁹⁵在美國的華僑們對於這支來自中華民國的球隊，無不產生他鄉遇故知的興奮之情，比賽當天「在國旗飄揚，國歌盪漾的氣氛中，會場的每個角落的中國觀眾，臉上那種感動、喜極而泣的表情，至今仍歷歷如繪地呈現在我眼前。」⁹⁶中華隊就在僑胞們與當地民眾的加油聲下以5：0獲勝，這場比賽中華隊贏的並不輕鬆，共比賽了12局才分出勝負。首戰的投手陳智源與張瑞欽因為大會規定必須隔場出賽，而無法對抗美北隊，這一場比賽中華隊派出郭源治擔任投手，在正規6局比賽中投出了13次三振，但是在第6局由於體力不繼，被對方選手巴特擊出一支3分全壘打，終場中華隊仍以4A：3獲勝取得決賽權，「余宏開安慰他說：『你總不好意思讓他們吃鴨蛋吧！』」⁹⁷在對戰美西隊比賽前，出現一段小插曲「美西隊抗議我用球棒不合規定」，⁹⁸但經過大會鑑定之後「裁判顧問蓋爾說：『那些球棒已被宣佈為合法的，不得對此再有異議。』」⁹⁹8月23日下午2時（臺北時間24日凌晨2時），中華隊出戰美西隊，投手陳智源先發，共投出12次三振，6局比賽中的後3局只讓對手一人上壘，終場中華隊以5A：0獲勝。

在台灣的民眾透過收音機與利用電話向報社詢問的方式整夜守候，當得知中華隊獲勝的同時，全國爆竹聲大作慶祝中華隊獲得第23屆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也是我國棒球第一次在國外獲得勝利，我國少棒也從這次冠軍中，引起國內對於棒球發展更大的信心。金龍隊獲

⁹⁵ 《台灣新生報》，1969年8月20日。同日的台灣日報、民眾日報、大眾日報，均是使用同一份新聞稿。

⁹⁶ 簡永昌，《棒球與我》，頁16。

⁹⁷ 《中國時報》，1969年8月23日。

⁹⁸ 《民族晚報》，1969年8月23日。

⁹⁹ 同上註。

勝的意義在於台灣在多次的棒球國際賽場中比賽，都未能獲得冠軍（主要是指之前程人參加的亞洲盃），而金龍隊卻成為首支代表台灣（當時稱之為遠東區（FAR EAST）隊）取得冠軍的隊伍，振奮許多台灣愛好棒球運動人士的心，也使得政府開始重視這項運動的存在，甚至影響其發展。在隔年1970年開始舉辦全國國中棒球，接續這個少棒的發展（之前的聯賽有成人、青棒、青少棒、少棒都是由私人機構，如中華日報舉辦，而非政府主辦），這是第一次與棒球運動相關的政策施行，也使國內體育培養人才政策與台灣棒球運動開始結合之外，更使得台灣棒球運動成為政府利用來凝聚民眾對於國家、民族的手段之一。

圖8 金龍少棒隊教練與球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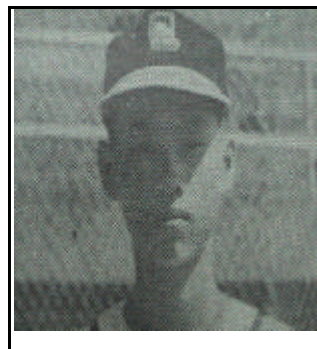
吳敏添教練



三壘手余宏開



投手陳智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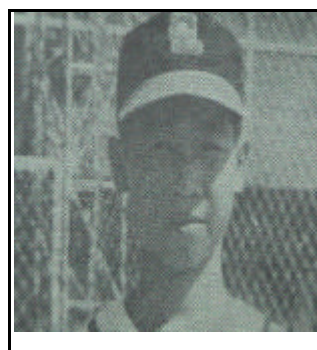
捕手蔡景峰



投手陳玉佼



捕手蔡松輝



投手郭源治



二壘手陳弘丕



游擊手莊凱評



右外野手林建良



投手張瑞欽



中外野手李俊杰



二壘手溫天壽



一壘手黃正一



左外野手陳鴻欽



圖8 資料來源：《少年文摘 中華少年棒球隊專輯》，出版年、地不詳，頁1-16。

其實從金龍少棒參加威廉波特所舉辦的世界少棒賽的事件上，我們可以看出，台灣當時並未對於棒球運動有任何的遠景，僅在日本方面的鼓勵下，由當時的棒球委員會理事長謝國城先生報名參加，經費來源雖然造成他們成行與否的插曲，但是沒想到獲得的果實是甜美的，並帶起台灣投入少年棒球運動的風潮，可是有引起了許多負面的問題，將在下一章討論。在金龍少棒之後，我國少棒連續奪得這項賽事的多次冠軍，並隨著一批批球員的成長，他們再度成為青少棒，甚至後來青棒徵召的對象，由於球員能力銜接得宜，在加上對於此項賽事重視程度與外國球隊完全不同，使得我國在1974年（民國63年）首度獲得這三種層級的冠軍，稱之為「三冠王」，但是這也顯現出台灣對於棒球發展，僅侷限於獎牌的獲取，為了獎牌一切犧牲都是值得的，但是1975年（民國64年）一如以往的，我國少棒、青少棒再度取得遠東區代表權，青棒也如期的將參加世界賽，但是等到少棒隊——高雄鼓山隊要出國參加世界少棒錦標賽時，美國世界少棒聯盟卻宣佈，今年不開放別的國家參與賽事，「根據美國報章雜誌的報導，世界少棒賽一強獨霸的局面，已使該項比賽贊助人漸失信心與興趣 除了中國觀眾有增無減外，美國觀眾有逐漸銳減的趨勢 世界少棒的經費，不靠門票收入維持，而是仰仗觀眾的踴躍樂捐，一旦觀眾對球賽不感興趣 世界少棒聯盟可能會陷入經濟上的危機。」¹⁰⁰這篇報導出現在1974年，我國第5次拿到世界少棒冠軍之後，美國方面的報導，

¹⁰⁰ 《中央日報》，1974年9月5日。

沒想到美國方面真的在1975年決定閉關自守，棒球協會理事長謝國城先生只好對國人說：「真對不起，我們的隊伍實在太強。」¹⁰¹我們球隊之所以這樣的強盛，主要是因為訓練方式的差異太大，美國方面，對於這些少年、青少年參加棒球運動的觀念是認為他們還處於發育階段，訓練方式不宜過度以免影響其未來發展，在美國由於很早就有職業棒球成立（1860年），因此在訓練觀念上較台灣方面不同，對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學童參加比賽，先前的訓練都是採取鼓勵方式，且規定所屬球隊為地方性球隊，教練必須不是專業教練（台灣並未有專業教練觀念），主要因為是認為這是一個夏令營的活動，不需太過苛求小球員，但是台灣方面採取的是土法煉鋼的訓練法，訓練學童方式也如訓練成人方式一般，因此我國的球隊在出國比賽時，也就比其他國家的球員來的強勢，主要是認為這項比賽也是一項正規比賽，在國內球迷也認定這是國家榮譽表現，因此無形中也給予這些小球員許多壓力。

但是這些發展與前面提到的體育政策有何關連，這得從奧運問題談起，其實我國是在1922年首度以「中國奧會」的身份參加奧運，之後因為國內情勢的問題，以及體育人才培訓不良，倒置在前文提到在1932年劉長春選手參加世運（也就是奧運），卻沒有拿下任何成績，這位選手是在輿論告知日本佔領的偽滿州國亦派出選手參加，中國方面才臨時決定派人參賽，未有一套完整的規劃訓練，當然無法與他國強手相比。之後中國與日本發生戰爭，戰爭期間就如前面提到有未有體育規劃，體育用途多是在為軍事用途服務。1949年之後政府遷台，與大陸方面形成對立狀態，中共也不停地在國際上擠壓我國的國際空

¹⁰¹ 張敬果等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頁238。

間，在參與奧運會的問題上，也成為他們積極爭取的目標於，於是1954年中共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奧會」參與奧運，且在1958年企圖排擠我國不成，旋而退出奧會，後因國際奧會對於我國奧會名稱易與中共混淆，在1959年暫時不承認我國會籍，直到1960年7月，我國改以「中華民國奧會」名義再度申請加入成功，之後又在「正名」問題上多所出入，如以中華民國奧會加入國際奧會，卻不能以中華民國國名參賽，所以當1971年中共正式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員之後，我國會籍保留即刻產生問題，且中共方面更是不停地阻撓我國參與奧運，進一步打壓我國國際生存空間，一直到了1979年我國奧會名稱被迫改為「中華台北奧會」，¹⁰²我國才在1984年（民國73年）重返在洛杉磯舉辦的奧運，雖然是歷經12年未參加奧運的情形下重返奧運，但卻也是所有參賽的141國中唯一不能使用國旗及國歌的隊伍，這種迫於無奈的情形下，我國只獲得舉重銅牌一面及棒球表演賽第三名，大陸方面共獲得15面金牌、8面銀牌、9面銅牌，這使得國家主政單位更確認了獎牌至上的目標，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奪取獎牌的想法也成了日後發展運動的中心，推動全民體育也是為了多培植能夠「為國爭光」的人才，¹⁰³並為了1988年的漢城奧運進行準備。綜觀這一時期的體育政策，主要在於培養優秀運動人才，與推廣全民體育為中心，因而在不同時間訂定的政策，還是以這兩個主軸打轉。

¹⁰² 林國棟著，《我國體育外交之研究》，台北，文景出版社，1988年，頁153-155。

¹⁰³ 《台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下）》，頁1427-1429。

表4 體育司成立至解嚴時期之體育政策分析

| 政策性質 政策 目標 政策 來源 | 教育化導向 | 競技化導向 | 軍事化導向 |
|--------------------------------------|----------------------------|--------------------------------------|---------------|
| | 國民體育特別 班實施計畫 (1977) | 鍛鍊身心、提高 活力、社會規範 行為 | |
| 改進國民小學 體育實施計畫 (1978) | 體育教學正常 化 | 培養優秀運動 選手 | 增強國民體力 |
| 發展體育五年 計畫 (1978) | 體育正常發 展、充實場地設 施 | 提高競技運動 水準 | |
| 加強中等以上 學校國防體育 實施計畫 (1979) | | | 尚武精神、國防 體能 |
| 長期培育中小 學優秀運動人 才實施要點 (1979) | | 培養優秀運動 選手 | |
| 積極推展全民 體育運動計畫 (1979) | 身心均衡發展 之健全國民 | 培養運動人才 提高運動技術 水準 | |
| 積極推展全民 體育運動重要 措施實施計畫 (1980) | 增建運動場 地、推展全民運 動、民俗體育 | 加強訓練選 手、提高運動技 術水準、加強國 際體育交流 | 推展國術 |
| 國民體育法 (1982) | 健全體格、國民 道德、充實生活 | | 民族精神 |
| 長期培養大專 院校優秀運動 | 推展全民體育 | 培養優秀運動 選手、參加國際 | |

| | | | |
|---|--|---|--|
| 人才實施要點 (1983) | | 競賽 | |
| 中等學校體育 促進會籌設要 點 (1984) | 推展學校體育 發展 | 辦理學校競 賽、培養優秀運 動選手 | |
| 各級學校體育 實施辦法 (1986) | 健全身心、運動 道德、體育知 識、運動興趣與 習慣 | 瞭解運動方 法、提升運動水 準 | |
| 積極推展全民 運動計畫 (1986) | 推展全民體 育、運動習慣、 健全體格、身心 健康、增進運動 設施 | 培養優秀運動 人才、提昇競技 運動水準、參與 國際競賽、加強 國際體育交流 | |
| 中等以上學校 運動成績優良 學生升學輔導 辦法 (1986) | | 培養優秀運動 選手、提昇運動 技術水準 | |

資料來源：曾瑞成，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頁234-235。

所以為了增加國際空間，與國際間的能見度，體育外交政策成為國家外交政策之一，培訓體育人才也在於獲取獎牌，因為只有獲得優秀成績，才能在體育外交一環受到國際的重視，棒球運動就成為一項工具，而這項工具不僅帶來國際名聲，更加凝聚台灣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後，政府創造出的國家困境下，全民的民族共識，就如同報導所提，在1971年由全國選拔賽所選出的台南巨人隊，他們要出國前，「巨人少棒赴美，中視贈與機票 省市等單位也各有補助」，¹⁰⁴除了中視負責來往機票，省府補助20萬元，臺北市補助20萬元，教育部補助

¹⁰⁴ 《中央日報》，1971年8月10日。

10萬元，台南市補助15萬元，國軍體育總會捐助10萬元，崇她社2萬元，舊金山美國銀行招待兩天一夜食宿，紐約花旗銀行及洛杉磯海灣石油公司各招待一天，另外8月17日巨人隊飛往美國前，「羅部長（時教育部長羅雲平）授旗勉為國爭光」，¹⁰⁵「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以夾克、球衣贈送 巨人隊 小將 表示 他們決定將這份關懷與愛護，化為報效國家的力量，在球場上好好打一場出色的球，在家裡作一位孝順的兒子，在社會上作一個好公民」，¹⁰⁶而如民眾預期的，巨人隊在有形無形的壓力下，獲得了世界少棒冠軍，開始成為「為國爭光」的外交工具。

第三節 體育多元化發展與棒球商業化

1987年，蔣經國先生宣布解嚴，台灣體育政策的發展也因此有了不一樣的方向，政治上蔣家勢力也隨著蔣經國先生的過世而逐漸衰退，繼任的副總統李登輝先生在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政治走向民主化。經濟上承繼各個國家建設與國際貿易發達，使得整體經濟環境快速成長。在這樣多元的環境下，體育政策的走向也呈現多元且更加精細的發展，最主要是改變以往過度重視軍事化與競技化取向的教育，因為在努力追尋獎牌的目標下，如不深植體育於人民生活之中，無法厚植人才培養工作，且呈現出來的狀態就是這些人才在退休之後，也無法從事與體育相關工作，因此在這個階段的體育政策所要做的工作仍在推廣體育教育，培養體育人才，與前期不同的是更加重視體育人才的生涯規劃，體育人才不再是國家的工具，應該重視

¹⁰⁵ 《中央日報》，1971年8月17日。

¹⁰⁶ 同上註。

體育人才的個人發展，而不僅在「為國爭光」。自1987年解嚴之後，體育政策理念約分為以下六點，第一、體育的目標在培育身心健全的國民；第二、學校的體育目標與理想宜以人本教育為導向；第三、運動樂趣的意識逐漸成為體育發展的重要因素；第四、運動經驗有助於人格的自我實現；第五、體育運動內涵的多元化；第六、推展全民運動與競技運動之關係密不可分。¹⁰⁷施政內容主要以推展全民體育，以培養身心健全發展之國民，及提昇競技運動成績，以拓展國際空間，提昇國家形象為兩大主軸，以教育部體育司為施政的主導單位，分別在學校體育、社會體育、國際體育和體育學術四方面推動體育發展。學校體育上，推動教育正常化發展，透過各級體育總會從1990年度推動運動競賽，獎勵成績績優學校，1987年度舉辦聯賽制度，從大專籃球、排球首先辦理，1997年再加上羽球、棒球；中小學方面自1988年度陸續辦理籃球、排球、棒球、壘球，並希望落實這些運動在大專院校往社團對社團、系對系發展，中小學增加經費補助，培育原住民選手運動潛能，發展特殊及殘障體育，最後在硬體方面增加體育場所與設備的建立。社會體育上，因為經濟繁榮，產業結構轉變（由農業工業 服務業），人民所得大幅提昇從1960年的152美元到1997年已提升至13198美元，運動休閒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份，因此政府推展全民運動，建立各地方簡易運動場地，由各級體育館舉辦定期各種體育活動，充實設備以培育基層選手；提倡固有體育運動，如國術以及民俗運動；推展社區全民運動，舉辦如槌球、慢速壘球、幼兒足球以提升運動風氣；提升國民體能，設立體能訓練指導班，推展職工體育，目前可見的即是體適能測試；最重要的是從1981年與1983年訂定的中正與國光體育獎章與獎金的頒發，鼓勵並建立培養優秀運動人才的一

¹⁰⁷ 曾瑞成，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1949-1997），頁267-269

貫制度，延伸至國防部有1988年頒訂的「國軍長期培養運動人才實施規定」，使選手得以繼續訓練；輔導職業運動成立，主要是棒球（1990年成立）、籃球（1995年成立），希望透過職業運動的推廣，提昇運動風氣。國幾體育運動上，在加深國內人才培育之下，積極參與亞、奧運，且在1987年解嚴之後與對岸之間的體育交流，也使大陸方面的體育人才往台灣發展，如舉重選手黎鋒英、桌球選手陳靜等等都前來台灣發展，我國更積極維護國際運動場上的會籍，並鼓勵或主辦各種國際賽事，邀請國外體育運動團對來台訪問比賽。

體育學術研究與發展方面，舉辦體育會議，出版中華體育季刊、國民體育季刊等等體育相關研究刊物，並鼓勵體育大專院校進行學術研究，希望拓展國內體育學術研究風氣。¹⁰⁸這時期政策制訂仍朝培養運動人才，拓展國際舞台的機會為主，延續前期的推展全民體育運動計畫，1989年教育部再制訂「國家體育建設中程計畫」，較前期不同的是在建立學校聯賽制度，推動職業運動，建立體育專業如專任教練，開拓運動員出路積極參加亞、奧運。但是在同一年也制訂「加強高中高職國防體育教育實施計畫」，體育還是呈現出工具性的軍事用途。另外在新「大學法」在1994年修改之後，體育課到了大四改為選修（前三年為必修），課程也叫以往呈現多樣、有趣的方向發展。整體而言這個階段的體育政策更加落實在體育運動員的生涯規劃，透過獎勵的落實（國光、中正獎章），以及教育多元，並在體育大專院校增設研究所，如師大體育系研究所（1970年即成立為最早的研究單位），國立體育學院成立教練研究所（1994年成立）、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也成立競技運動研究所、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體育研究所，私立

¹⁰⁸ 同上註，頁282-289。

方面有文化大學成立運動教練研究所（1994年成立）、輔仁大學成立體育研究所（1999年成立），這些都增加運動員的出路。兩岸之間的體育發展，其實在1987年內政部開放大陸探親之後，也由大陸「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提出邀請，進行體育交流活動，這也使許多選手前來台灣進行經驗傳授，大陸在工具化使用之下，為了延續更多的運動人才，廣大人口中挑選優秀人才加以訓練，透過退休的優秀運動員加以訓練，使得在國際賽場上，能夠有許多成績表現，這是值得台灣學習的。¹⁰⁹

而棒球發展在這一段期間也有了轉變，我國少棒雖然在1977到1981年獲得世界冠軍，但是在國際賽事上，不再是一路長紅的情形，各個國家紛紛以中華隊作為目標，以打倒中華隊為他們努力的方向，但是在這時候，原先蕭條已久的成人棒球，因為這些三級球員的逐漸成長，有了接續的人選，而國內沒有這些接續上來選手的發揮場所，他們為了生計問題，加上國際賽場上表現的優異，成為國外職業球隊招攬的目標，紛紛投向國外市場發展，國內在如此的環境下思索要如何發展國內的棒球，職棒因應而生。

雖然在1975年鼓山少棒隊被美國方面拒絕於門外，但是兩年之後中華少棒隊重返世界賽，又連續5年奪得冠軍，而青少棒在加入世界青少棒賽之後（1972年加入），連續9次奪魁，青棒則是加入之後（1974年）連續五年獲冠，對於我國棒球運動而言，無疑是最光輝的時代，就在此時，為了我國三級棒球不辭辛勞，四處奔走的謝國城先生卻在1980年12月29日與世長辭，這對於棒球界是個不小的打擊，由於他的

¹⁰⁹ 同上註，頁289-328。

努力，使得紅葉棒球隊能有機會打敗日本和歌山代表隊，也因為他，金龍少棒隊才能夠出國打出台灣人的信心，因為他，三級棒球才有這樣光輝的一頁，因此他被稱之為國內的「少棒之父」。

少年棒球在1980年代世界少棒錦標賽中，除了1983年到1985年連遠東區代表權都未取得外，也拿過四次冠軍，就在1980年代末「世界少棒聯盟指我違反四項規定，要求我提解釋否則不准參加比賽」¹¹⁰，指出1990年參賽的善化少棒隊，成員中有超齡、教練非業餘人士擔任、善化隊非社區球隊等等問題，使我國認為美國少棒聯盟方面似乎是故意雞蛋裡挑骨頭，加上美國另一個小馬聯盟（Pony）邀請我國參加，使得國內對於已經參加多年的世界少棒聯盟萌生退意，終於在1996年，高雄市復興少棒隊奪得冠軍之後，因為世界少棒聯盟再度提出「我國少棒若在遠東區連續兩年奪冠，第三年將不能參加世界賽」¹¹¹的不合理要求，於是中華少棒聯盟會長廖敏雄決定，不需要削足適履，也希望我國少棒能夠有更正常的發展，所以在近年我國開始自己舉辦少棒比賽，還有參加國際棒協（International Baseball Association，簡稱IBA）所舉辦的各項賽事，希望不再只是為了參與世界少棒賽，而忽略其他未被選上代表隊的小選手們的發展，還給國內少棒一個正常的環境。

至於在青少棒與青棒方面，雖然在1970、1980年代世界少棒聯盟舉辦的青少棒、青棒賽中時常奪得冠軍，但是國外的球隊業漸漸強大，從比賽中看出，對手越來越難對付，而在國內青少棒、青棒的發

¹¹⁰ 《聯合報》，1990年10月25日。

¹¹¹ 《大成報》，1996年11月21日。

展卻出現了不均衡的狀態，由國內選拔賽看出，幾乎年年都是由屏東美和中學與臺北華興中學獨霸（見表一），會發生這種現象主要在於球員對於就讀明星學校才能有機會奪得「世界冠軍」的一窩蜂現象，導致其他學校招收不到實力較強的學生，而在選拔賽上當然就容易輸球，而國家對於這種明星及球員集中的現象並未加以制止，使得青少棒、青棒發展產生不均衡現象。

表5

| 年度 | 1972 | 1973 | 1974 | 1975 | 1976 | 1977 | 1978 | 1979 | 1980 |
|-----|------|------|------|------|------|------|------|------|------|
| 青少棒 | 美和 | 華興 | 美和 | 美和 | 美和 | 華興 | 榮工 | 東峰 | 美和 |
| 青棒 | 未選拔 | 未選拔 | 美和 | 華興 | 美和 | 美和 | 味全 | 長榮 | 美和 |

資料來源：《民生報》，1991年8月19日。

由於長期的重視錦標，導致我國的棒球發展產生工具性使用的情形，隨著政治開放，社會大眾的資訊發達，對於棒球運動也不再寄情，棒球選手因為在國際場合的好表現受到國外職業球隊的重視，好選手紛紛向國外發展，台灣努力建立的三級棒球，卻逐漸的式微，於是在1989年由教育部體育司提出提升棒球運動計畫，¹¹²推展各級棒球聯賽制度，才使棒球運動重新開展，而對於整體棒球運動最大的影響，仍在職業棒球的成立。以下將介紹職業棒球運動的商業化過程。

¹¹² 詳見教育部體育司網站：www.edu.tw/EDU_WEB/Web/PHYSICAL/home.htm。

表6 1974年到1985年球員外流名單

| 年度 | 球員 | 加入球隊 |
|-------|-----|-----------------|
| 1974年 | 譚信民 | 日本獅子隊 美國辛辛那提紅人隊 |
| 1978年 | 高英傑 | 日本南海老鷹隊 |
| 1978年 | 李來發 | 日本南海老鷹隊 |
| 1980年 | 郭源治 | 日本中日龍隊 |
| 1980年 | 何明堂 | 日本熊谷組隊 |
| 1980年 | 李志俊 | 日本熊谷組隊 |
| 1981年 | 劉秋農 | 日本樂器隊 |
| 1982年 | 林華章 | 日本山葉發動機隊 |
| 1982年 | 黃廣琪 | 日本山葉發動機隊 |
| 1983年 | 陳大豐 | 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學隊 |
| 1984年 | 林仲秋 | 日本伊藤百貨隊 |
| 1984年 | 葉福榮 | 日本伊藤百貨隊 |
| 1984年 | 徐生明 | 韓國化粧品隊 |
| 1984年 | 郭泰源 | 日本西武獅子隊 |
| 1985年 | 莊勝雄 | 日本羅德星座隊 |
| 1985年 | 趙士強 | 日本本田隊 |
| 1985年 | 許正宗 | 日本本田隊 |

資料來源：詹德基，我國棒球運動的發微與展望，《教育資料集刊》第10卷，頁477-478。

(一) 職業棒球的成立與商業化過程：

由於三級棒球的式微，國內成棒隊伍雖然在1980年代初期，由新任的棒球協會理事長嚴孝章，向國際棒協重申我國的會籍問題，¹¹³終於我國成棒隊有機會參加國際賽事（除了亞洲盃之外），1982年成棒代表隊參加世界盃成棒賽，獲得第3名，1983年在亞洲盃獲得冠軍，1984年參加奧運的棒球表演賽，在強敵環伺的情形下，奪得銅牌，雖然國際賽事十分風光，國內甲組成棒賽卻是乏人問津，於是兄弟飯店老闆洪騰勝先生邀集國內棒球界人士，在1987年成立「職棒推動委員會」，希望國內成立自己的職業棒球，除了使成棒選手有發揮的空間之外，也希望留住不停外流的國內成棒好手，因此成立以兄弟、三商、統一、味全四個公司組成的中華職業棒球聯盟，希望帶給台灣民眾一個新的棒球環境，藉此推廣台灣的棒球。

職業棒球成立之後，4支由甲組所組成的職業棒球隊，分別有各自的吉祥物，兄弟象、統一獅、三商虎、味全龍。在1990年3月17日開打，為了增加比賽可看性，更從國外聘請洋將各隊4名，希望炒熱整個職業棒球比賽，在1992年（職棒3年），適逢國內成棒代表隊在巴塞

¹¹³ 因為在1980年時，棒球協會會長謝國城先生因病過世於任內，由當時任常任理事的林鳳麟先生代理，之後又在1981年6月選出嚴孝章先生擔任理事長一職，他發現由於我國已經5年未參加國際棒協舉辦的賽事，因尤其是成人棒球項目上，此他立刻行文國際棒協，我國才有機會重新參加如洲際杯與世界盃...等等的賽事。

隆納奧運奪得銀牌，這些國家代表隊成員，除了郭李建夫成為日本職棒阪神虎隊交涉的目標，並且最後以高價與他簽約之外，有多名球員紛紛加入新成立的兩支甲組球隊 - 俊國與時報，終於在職棒4年成為6隊開打的情形，這使得在職棒3年上半球季曾經低迷的職棒，又有了新的話題以及對戰組合，而分別在職棒3、4、5年中獲得冠軍兄弟隊，更是吸引球迷的票房保證（見下表各隊人數統計元年到4年），使得職棒前6年票房單季票房約都維持在5千5百人左右（見下表職棒人數統計元年到6年）。

圖9 職棒元年四隊的標誌分別為味全龍、統一獅、三商虎、兄弟象（由左至右）



資料來源：<http://netcity2.web.hinet.net/UserData/slam/cpbl/cpbl01.htm>。

表7 職棒元年 4年各隊觀眾人數統計表

| 隊 伍 | 職棒元年 | | 二年 | | 三年 | | 四年 | |
|-----|------|-------|------|-------|------|-------|------|----|
| | 人數 | 名次 | 人數 | 名次 | 人數 | 名次 | 人數 | 名次 |
| 兄弟象 | 5964 | 四 | 7491 | 三 | 9153 | 一 | 8980 | 一 |
| 味全龍 | 5153 | 一 | 5876 | 二 | 6748 | 二 | 6635 | 三 |
| 統一獅 | 3912 | 三 | 5028 | 一 | 5828 | 三 | 5809 | 二 |
| 三商虎 | 4969 | 二 | 4948 | 四 | 5784 | 四 | 4889 | 六 |
| 俊國熊 | 未加入 | ----- | 未加入 | ----- | 未加入 | ----- | 4635 | 四 |
| 時報鷹 | 未加入 | ----- | 未加入 | ----- | 未加入 | ----- | 4620 | 五 |

林千源，談台灣職業棒球隊之經營策略 - - 以兄弟象隊為例，《中華體育》第8卷3期，頁49。

表8 職棒元年 6年人數統計表

| 年度 | 總場次 | 總觀眾人數 | 平均單場觀眾人數 |
|-------------|-----|-----------|----------|
| 職棒元年（1990年） | 180 | 899,955 | 5,000 |
| 職棒二年（1991年） | 180 | 1,050,405 | 5,836 |
| 職棒三年（1992年） | 180 | 1,238,063 | 6,878 |
| 職棒四年（1993年） | 270 | 1,600,549 | 5,928 |
| 職棒五年（1994年） | 270 | 1,607,677 | 5,954 |

| | | | |
|-------------|-----|-----------|-------|
| 職棒六年（1995年） | 300 | 1,646,361 | 5,488 |
|-------------|-----|-----------|-------|

資料來源：<http://www.cpbl.com.tw>，中華職業棒球聯盟網站。

而配合職棒的成長，相關的商機也隨著出現，當時台灣社會正值風行衛星電視（中、小耳朵），1992年亞洲衛星（簡稱亞衛）有意採取立即轉播的方式，播出中華職棒，雖然在職棒開打之初，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以下簡稱中華聯盟）有意邀請三台（台視、中視、華視）以立即實況轉播方式轉播，但是三台意願有限，隨著球迷人數的增加，轉播的必要性相對提昇，加上最早以廣播報導實況的中國廣播公司，廣播人員素質良莠不齊，使得轉播水準低落，因此職棒公司有意向亞衛購買時段嘗試播出，終於在1994年，職棒5年與年代公司簽約轉播球賽的權利，簽約金為3年9千萬元，¹¹⁴而在職棒6年，由於職棒越來越熱，使得其他電視公司開始對於轉播權的取得越來越有興趣，加上中華聯盟開放招標，於是有多家有線電視公司參與招標，最後由和信集團緯來公司以3年15億4千5百84萬元的天價得標，¹¹⁵經由中華聯盟規定，權利金65%由6球團均分，其他35%由各隊戰績表現判定之後，再由聯盟分配。¹¹⁶另外以兄弟象隊為例，兄弟隊母公司以兄弟飯店為主，由於3年連續冠軍，替他們帶來不少的商機，如中華汽車以他們的商標縫製在球員的球衣上，以達到廣告之便，兄弟在職棒3年的廣告收入即有3百萬元，¹¹⁷這些在在看出職棒商機無限，但也就在如此的情形下，發生了場外不良事件 - 職棒簽賭。

¹¹⁴ 《中央日報》，1994年3月9日。

¹¹⁵ 《大成報》，1995年8月19日。

¹¹⁶ 《民生報》，1995年7月26日。

¹¹⁷ 《民生報》，1992年11月20日。

（二）職棒簽賭事件及其影響：

1995年（職棒6年），一篇「職棒天價賭資。一年300億元」的報導，¹¹⁸指出當年自4月起，已經開始有六合彩莊家在場外收集賭資，下注職棒比賽，一年下來共約有3百億元的賭資，隱約開啟職棒簽賭案的洶湧暗潮。職棒7年6月報導「職棒賭風日熾，聯盟促自清自律」，¹¹⁹提到有人發出黑函影射當年味全龍隊總教練徐生明，與時報鷹隊總教練李瑞麟，涉嫌賭博操控比賽，但是兩人對此都否認指出少數人難以操控比賽等語，中華聯盟當時秘書長屠德言更發出呼籲賭徒，不要對職棒這隻金雞，做出殺雞取卵的行為，否則大家沒得玩，¹²⁰這主要在於我國並未如美國開放職棒場外賭博合法，嚴禁球員與教練涉及，所以只要牽涉賭博將有違法的可能。而這樣的情形其實在美國與日本都相繼發生過相同的事件，如美國職棒方面，在1875年時，曾經爆發所謂的「黑襪事件」，以及1988發生的彼得羅斯（Pete Rose美國職棒目前的安打王）也是因為涉嫌賭博，而無法進入棒球名人堂的最高榮譽；另外在日本方面則發生1969年的「黑霧事件」，也是因為球員涉嫌打放水球，但是美、日雙方對於這種行徑都是嚴加懲處，其實這是運動進入職業化，有它的商業利益存在時，當球員認定本身是商品時，個人就容易在金錢中迷失，而產生這種不法的行徑，在美國是有合法的場所可以進行場外下注，台灣卻在無管道下，產生檯面下的非法途徑。

不幸的事情終於在種種因素下發生，就在1996年（職棒7年）8月

¹¹⁸ 《中時晚報》，1995年12月16日。

¹¹⁹ 《中央日報》，1996年6月17日。

2日，兄弟象隊與興農牛隊（前身為俊國隊¹²¹）比賽之後，兄弟球員陳義信、陳逸松及吳復連等3人，「被押走脅迫以後要『配合』」，¹²²但是3人都否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於是當時的法務部長廖正豪「強調絕不容許黑金介入純淨的體育活動」¹²³開始展開大規模的調查。這時候球員與中華聯盟方面紛紛表現反黑金，並發起自清運動，中華聯盟與職棒球員工會都發表聲明，希望有一個乾淨的打球環境，¹²⁴但是隨著檢方的偵察陸續查出各地的簽賭站，¹²⁵陸續爆發出球員涉嫌放水，「幾乎每隊都有人涉嫌放水參賭」¹²⁶的報導不脛而走，使得職棒簽賭案鬧得不可開交，原先只涉及黑道恐嚇，但是在職棒8年開打前，卻又傳出球員涉賭，「職棒簽賭案，約談郭建成」¹²⁷提及郭建成選手等人涉嫌比賽時放水收賄，背後更擴大牽涉中部地方民意代表與嘉義「蕭家班」蕭登獅等人為最大的「組頭」，而案件就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最後共有23名球員被判刑，其中包含有時報鷹隊球員20名，使得時報鷹隊面臨解散的危機，中華聯盟採取其他各隊支援的方式，希望維持時報鷹隊，但是打擊已經造成，時報鷹隊就在職棒9年退出職棒。

諷刺的是，年代公司更在1995年申請成立新聯盟，並且在在1996年以那魯灣公司的名義成立新的職棒聯盟 - 台灣大聯盟，以本土、在地化（共有4支球隊，分屬台北 - 太陽隊（Gida）、台中 - 金剛隊

¹²⁰ 《聯合報》，1996年6月18日。

¹²¹ 俊國熊隊於職棒6年（1995年）由長億興農集團買下，原先取名為興農熊，後在職棒7年改名為興農牛。

¹²² 《中國時報》，1996年8月4日。

¹²³ 《中央日報》，1996年8月5日。

¹²⁴ 《青年日報》與《民生報》，1996年8月8日。

¹²⁵ 《聯合報》，1996年8月18日。

¹²⁶ 《中國時報》，1996年11月10日。

¹²⁷ 《中央日報》，1997年1月29日。

(Agon) 嘉南 - 勇士隊 (Luka) 高屏 - 雷公隊 (Fala) , 四隊隊名以原住民語發音) 強力棒球為訴求 , 希望吸引新的看球族群 , 本身的球員以甲組成棒隊的聲寶巨人隊和乙組成棒的俊國熊隊為班底 , 沒有中華聯盟經營幾年下來產生的明星球員 , 於是當中華聯盟因為簽賭案與球員放水收賄事件搞的焦頭爛額之時 , 「邱復生 : 『那魯灣兩億元簽下職棒強將』」作為號召 , ¹²⁸開始網羅中華聯盟的明星球員 , 希望以高薪與優厚保障來打動球員的心 , 而中華聯盟方面提出合約問題 , 「選手契約不得片面終止」 , ¹²⁹希望球員能夠遵守合約 , 但是球員面對在中華職業棒球聯盟卻一再面臨黑道威脅 , 與被懷疑涉嫌放水的陰影下 , 共有9名球星跳槽 , 球員就在新、舊聯盟的相互合約問題間苦惱 , 在1997(中華職棒8年) , 台灣大聯盟也順利成立開打 , 從挖角事件開始 , 兩聯盟就開始呈現對立的狀態 , 最明顯的在中華聯盟票房上 , 出現了嚴重的衰退 (參見下表統計) 。

表9 職棒8 13年觀眾人數統計

| 年度 | 總場次 | 總觀眾人數 | 平均單場觀眾人數 |
|-----------------|-----|---------|----------|
| 職棒八年 (1997年) | 336 | 685,832 | 2,041 |
| 職棒九年 (1998年) | 315 | 690,089 | 2,191 |
| 職棒十年 (1999年) | 278 | 496,433 | 1,786 |
| 職棒十一年 (2000年) | 180 | 301,671 | 1,676 |
| 職棒十二年 (2001年) | 180 | 337,707 | 1,876 |

¹²⁸ 《民生報》, 1996年9月18日。

¹²⁹ 《民生報》, 1996年9月19日。意思在球員與公司之間, 若公司未與球員中止合約前, 球員仍屬公司商品, 不得與其他球團或球隊簽約。

| | | | |
|--------------|-----|---------|-------|
| 職棒十三年（2002年） | 180 | 532,304 | 2,957 |
|--------------|-----|---------|-------|

資料來源<http://www.cpbl.com.tw>，中華職業棒球聯盟網站。

從棒球成為一項職業，我們就可以看出這項運動已經從單純的運動項目轉變為商業行為，球員與球團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員工與雇主的關係，另外在球員身上看到廠商標誌，貼在球衣上，最鮮明的例證即是兄弟象隊，兄弟隊的母公司是以兄弟大飯店為主，收入除了靠門票之外，就是廠商的贊助，而贊助的方式兄弟是以贊助廠商的符號縫在球衣上，而其他球團更是直接，在從國外找來的洋將上動手，他們沒有了自己的名字，改以公司的商品作為名稱，如統一獅隊的「阿Q」（盒裝泡麵）興農牛隊的「勇壯」（農藥名）三商虎隊「巧福」（餐飲連鎖店名）...等等，加上後來亞衛開啟的電視轉播工作權利金問題，球員與其他廠商簽約拍商品廣告，如有棒球先生之稱的李居明選手，就有一支「巧口花生仁湯」的廣告，再加上球場外野牆上的廣告看板，也成為各家廠商進駐的標的物，都在在的顯示出職棒的商業化。就如前面所提的，其實簽賭案也是商業化下的不良產品，球員失去了原先單純打球的本質，受到金錢與暴利的威脅利誘下，否定了自己成為職業球員應有的職業道德，而產生打放水球的狀況，事實上所謂的放水球如果不是經過專業人士從影帶上的一再審視，其實一般民眾根本無法看出，這也就是為何在簽賭案告一個段落之後，球迷對於球員的表現仍無法信任的最大原因。

職棒將棒球帶入商業化的路程，徹底改變以往對於棒球那種賦予「為國爭光」的民族主義思想，轉變成為正常的娛樂觀念，也逐漸改

變以往訓練選手的觀念，因為體育保送政策目前仍在施行，對於球員的訓練仍存在必須加強訓練才有辦法升學，也有的學校的觀念已經改變，對於球員的訓練是在課餘之後的訓練，球隊或許無法奪得耀眼的成績，但球員的學業成績卻是在學校要求下正常發展，改變以往過度練習而荒廢課業，導致既使打出好成績而保送升學，卻在大學課業不如其他聯招進入的學生，而遭到退學的命運，違背了當初施行保送政策的初衷，希望在正常教育下成為學生課餘活動的表現，而非錦標、獎牌為取向的教育方向。另外因為職業棒球的成立，給予參與棒球運動球員的本身以及父母而言，小孩若是在棒球運動中能夠有好的表現，就能夠成為未來獲取工作的條件，加上職業棒球的逐漸發展，許多訓練觀念也漸漸建立，不在過度操練球員，因為早期在為了奪取好成績下，都過份操練球員，使得球員高峰期提早，在進入成人棒球時，手臂已嚴重受傷，如我國首位在美國登上大聯盟投手板的曹錦輝選手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他在青棒時期已經是球隊（高苑工商）的當家投手，又是國家代表隊一員，他的手臂就是在這一段時期過度訓練導致手臂肌腱嚴重受傷，必須進行所謂的「湯米瓊斯」（韌帶移植）手術，經過兩年的休養才在2003年在美國大聯盟進行比賽，而這種重視訓練的情形所影響的不僅是一個個案而已，卻是整體台灣早期棒球發展的現象，但是經過職業棒球的發展，這種情形已經逐漸減緩，因為球員也明白，在有機會成為職棒選手的過程，必須調整自己的訓練方式，才不至於使生財工具提早報銷，這樣的觀念形成也是在棒球商業化下，才產生出的新觀念，這些觀念也在在的影響棒球運動的正常化發展，棒球運動選手不再是工具，有了職業運動，球員也在未來生涯上有更明確的出路。

第五章 體育與棒球發展的思考

體育發展是配合政策制訂而來，國家在對於國內體育選手的培訓上，也是為了國家所需而來，而棒球運動亦是體育活動的一支，在體育政策的規劃下，勢必受到一定影響，台灣體育與棒球發展，一直是台灣教育中一個重大缺失，以下將針對體育與棒球發展，在上文論述之下，所衍生出的問題，因此本章將對於兩者的問題作一探討說明。

第一節 體育與棒球發展的弊病

就教育而言，體育教育的原始目的是教導人類適應環境的能力，透過簡單的肌肉訓練，使身體的機能符合環境需求，而這種近代的體育觀念卻也因為國家政治力的影響有了改變，體育政策的制訂成為國家需要而制訂，在整體的教育下，體育似乎成為國家鍛鍊人民的工具，而鍛鍊人民有何用途，又因時代演變而有不同的情況，在台灣的體育政策制訂也是按照這樣的情形而有階段性的改變，戰後初期台灣的環境處於不穩定的階段，為了掌控民眾，必須從教育著手，在政治力控制教育的狀態下，教育成為一項工具，當時的體育也是教育的一環，中心目標在訓練人民的身體，已成為「反共復國」之用，因此在體育政策制訂上，也加入了軍事訓練的元素，如體育課程中加入國術訓練，更在1952年實行軍事訓練，從中等以上學校訓練成為軍事人才，學習如何投擲手榴彈，固定時間也學習打靶，刺槍術的教學等等，或是定期的舉行軍歌比賽，作用在於營造這種隨時可以上戰場的心理，另外呈現在體育賽場上，不管最後獲得什麼樣的運動錦標，卻只

能在你的錦標旗上看到斗大的四個字「反攻前驅」(見圖10)。

圖10 圖為第8屆台灣省運動會



資料來源：徐宗懋，《1950仲夏的馬場町》，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43。

另外不停的教育與改造你的思想，認同、服從領袖的指導（見下圖11，在面對領袖的玉照前，鍛鍊強健的身體，並在背上刻上「精忠報國」）。這個教育下，唯一領袖是當時候人民所託，作用再控制人心，

必須服從，建立出一言堂的社會。

圖11



資料來源：徐宗懋，《1950仲夏的馬場町》，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42。

這樣所建立出的社會是單一的，所做出的影響卻是十分深遠的，因為民眾在無法接觸到外來資訊下，且在政府強烈宣導下與政治恐嚇下，連原先應該單純的體育教育，被冠上更多附加的意義與價值，這樣的情形只是訓練出體育工具，而非真正落實體育教育。

這時期的棒球運動卻與這樣的情形呈現不同面向，因為棒球運動是從日治就存在在台灣的運動，台灣民眾也在日治時期建立起「玩」棒球概念，認為棒球運動是一項運動而已，這時候雖然政府努力的進行思想改革，棒球運動還只是在台灣人自己玩的狀態，並未被賦予其他意義。但是到了1960年之後，在軍事上與對岸對峙的情形仍舊存在，體育教育除了軍事用途之外，更賦予另一項用途，那就是外交工具，因為在1949年中共成立政權之後，不停排擠我國在國際上的空間，1954年中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奧會」參與奧運，且在1958年企圖排擠我國不成，旋而退出奧會，後因國際奧會對於我國奧會名稱易與中共混淆，在1959年暫時不承認我國會籍，直到1960年7月，我國改以「中華民國奧會」名義再度申請加入成功，之後又在「正名」問題上多所出入，如以中華民國奧會加入國際奧會，卻不能以中華民國國名參賽，這些問題一直到了1971年中共加入聯合國，我國奧會資格「正名」爭奪戰，瞬間成為能否保留會籍的生存戰，中共方面一再阻撓我國參與奧運，進一步打壓我國國際生存空間。而國家因為奧運需要開始重視體育人才培訓的用途，成為奪牌工具，這也是從楊傳廣開啟這扇門，1960年楊傳廣代表我國參加第17屆奧運，獲得十項運動銀牌，另外是紀政在國際上的表現（1970年左右，獲得國際賽場田徑好成績），但是除了他們之外，似乎沒有其他項目能在國際上揚名，於是才有一連串培養人才、訓練師資、興建場館，與制訂相關保送政策的

動作出現，而這些政策的目的是在於拓展國際空間（因為1971退出聯合國），獲取國際賽場中的獎牌而做的努力，但是對於運動員的整體生涯規劃卻沒有加以重視，這樣相同的情形也發生在棒球運動上。

棒球運動因為紅葉、金龍而受到政府重視，由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教育廳都給予補助，但是這個補助也是希望棒球運動成為拓展國際空間的另一項工具。雖然從紅葉開始，對於球員升學問題也加以解決，如紅葉全體球員直升桃源國中（同在紅葉村），之後的金龍少棒隊，更受到蔣夫人（宋美齡）的關愛，全員補助他們進入她所創辦的私立華興中學，並成立華興青少棒隊，之後更成立青棒隊，另外，在南部屏東地區，由徐傍興醫師夥同好友成立美和中學，且成立美和青棒、青少棒，¹³⁰這兩所學校成為這時候少棒選手必進的兩所中學，尤其那些曾代表出國比賽的代表隊，必成為這兩個學校網羅的目標，這看來對於台灣的棒球人才培養上，是相當好的示範，但是衍生出的問題不在從少棒到青棒，而是青棒之後，學生為了能夠通過從1966年制訂的保送制度，全心投入比賽與訓練，而嚴重的荒廢了在學習過程中應有的智育教育，造成一般民眾亦認為，會去運動的，就是不會讀書的想法，而這種情形之所以有這樣的演變，全歸因於國家對於國際賽場上名次的看重，為了有好的比賽成績，因此在保送制度上也降低錄取標準，使得這些體育優秀的學生也真的成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代名詞。事實上有這樣的情形產生，是因為國家在重視競技成績之下，運動選手僅能淪為國家的工具，國家對於你的生涯規劃，僅止於你的運動生涯，當不能再「為國爭光」之後，運動選手對於國家、對

¹³⁰ 原為屏東六堆客家地區在1970年舉辦六堆少棒賽，後來因為吸收1970年再威廉波特失利的七虎少棒隊成員，而成立美和中學青少年棒球隊，之後又成立青年棒球隊。詳見美和

於大眾就失去了意義，留下的僅有獎牌、紀錄。

棒球發展亦是如此，事實上許多棒球選手紛紛指出若是國家或是主導棒球業務的單位（指的是棒球委員會，1973年改為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能夠安排選手的出路，也就是能有長遠的目標為棒球選手做一個完整的生涯規劃，他們更可以安心的從事棒球運動，才不會在青棒階段（也就是高中）結束之後，就必須面臨自己抉擇的階段，雖然在當時有許多公司成立棒球隊，如合作金庫、榮工處、台灣電力公司、台灣啤酒 等等，卻沒有一個管道可以安排這些球員的未來，若是進不了這些球隊或是無法保送升學，生活將出現問題，如在那一段連續奪得冠軍的時期，為了奪取代表國家的出賽權，許多球員由於過度訓練而得到了「少棒肘」，¹³¹使得手臂無法再度使用而斷送選手生涯，如少棒紅極一時的「兩齒仔」許金木，他在進入國中（華興中學）之後，因為手臂及身材問題無法突破，而選擇退出棒球界，有了不錯的發展¹³²，而其他的選手並不像他那麼幸運，除了訓練過度可能造成的運動傷害外，造成另一個問題就是課業的荒廢，1969年為金龍少棒一員的余宏開，¹³³高中畢業之後由於課業不佳，他說：「『牛頭班』，哪考得上（大學）！」，¹³⁴他只好到處打零工過活，這突顯出當時為台灣出國比賽的小選手，由於訓練過多導致課業荒廢，在這個現今文憑至上的

中學網站：www.asp.mhsh.ptc.edu.tw。

¹³¹ 所謂的少棒肘經過台大醫學院外科醫生韓毅雄先生的研究，兩年之內他研究台灣少棒選手的手臂情形，發現肘關節內髁（ㄅㄛ所指的是肘部內側），都有肥大的情形，之後如果繼續使用，將使得骨頭，產生脆化而容易破碎，且經過他的抽樣訪問得知都經歷過這個部位酸痛的情形，他強調這是因為國內少棒選手過度訓練的結果。韓毅雄，《健康世界》115期，1985年7月，頁32-36。

¹³² 根據報導，許金木選手後來投入紡織業發展。《自由時報》，1996年11月8日。

¹³³ 余宏開先生於1995年11月7日上午因車禍身亡。《自由時報》，1995年11月16日。

¹³⁴ 《中國時報》，1982年7月16日。

社會，他們若無法在球技上繼續突破，獲得升學的機會，將落入沒有文憑也沒有一技之長的窘境，生活將產生問題，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許多球員只好在沒畢業前必須想清楚要升學或是繼續打球，其中許多選手都選擇升學或是畢業後就業，無法從事自己喜歡的棒球運動，且有人提出國家花費在這些球員上的投資，卻在沒有一項良善規劃下化為烏有，甚是可惜，¹³⁵但是幸運的是，棒球運動又與其他運動在台灣有不同的發展，那就是職業棒球的成立。

第二節 台灣人對於棒球觀念的轉變：

（一）日治時期：

日治初期由於台灣人因甲午戰爭之後，成為中國的敗戰犧牲品，使得日本在治理台灣初期，以武力鎮壓為主，以此平息台灣人民的反抗（如 1915 年西來庵事件），而日本人開始對於台灣的政策，希望採取漸進式教育，從年 1898 年（明治 31 年）設立公學校，教導台灣人民學習日語，但是仍然保留清朝時期的《三字經》、《孝經》這些傳統科目，目的想吸引台灣人對於新政權的支援，¹³⁶這其中不乏新式教育如算術、唱歌和體操。而在大正時期，因為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引起韓國「三一事件」之後，改變日本人對於殖民地的統治政策，開始進行同化政策，並且在 1919 年（大正 8 年）派駐文官總督，在教育上希望「將台灣教育成日本人，以強化日

¹³⁵ 張敬果等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榮獲三冠王國手名冊，頁503-577。

¹³⁶ 派翠西亞 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頁15-17。

本之擁有台灣」，¹³⁷並且提倡台灣人與內地人（日本人）共學，內台婚姻合法化 等等政策，而台灣民眾也這樣的大環境之下，有機會接觸棒球這項原先只流行於日本人社會中的運動，台灣人對於這項運動開始是非常反對的（前面已經提及），在這時其台灣仍是農業社會，所有物資又是提供給日本政府，人民生活困苦，對於棒球這種不事生產的運動，當然是反對的，而在同化政策之下，棒球也由社會球隊從新回到學生社會中，尤其是在 1915 年（大正 3 年）甲子園高校棒球聯盟開打，也相對引起台灣日人與台灣人中學校一陣棒球狂熱，開始在台灣比賽，加上後來有幾名台灣球員前往日本職棒發展，使得台灣人也漸漸接受這項運動，使得棒球在台灣也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份，另外對於棒球這項運動，對於台灣民眾一開始的認知是不是生產的，但是經過棒球運動傳入台灣人生活之後，他們也漸漸了解，棒球是有其利益存在的，如先前提到的嘉農棒球隊，學校的第二期球員之一的吳昌征（吳波），就在 1937 年（昭和 12 年）4 月，加入日本職棒的巨人隊，他的薪水是一個月 140 日圓，當時嘉農校長月薪也是 140 圓，¹³⁸這對於吳昌征這樣農家出身的小孩，無疑是一筆不小的收入，除了他之外，許多台灣選手也在日治時期，加入日本職棒，這影響到後來台灣棒球延續日本風氣許久，也使得台灣人加深對於棒球的愛好。

（二）戰後初期：

戰後初期，台灣在充滿希望的心態下，迎接「祖國」的到來，但是來台負責接收官員，由於接收的不當，而引發了台灣內部的通貨膨

¹³⁷ 同上註，頁69。

¹³⁸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頁94。

脹，以及物資缺乏，最後又因為查緝私煙而引起了省籍衝突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從大陸調大軍來台鎮壓，使台灣人民避免接觸與政治相關的事物，轉移到對於棒球的關注，於是在謝東閔先生的支援下，成立了中華民國棒球委員會，推展各級棒球比賽。1949年12月，國民政府遷台努力興建台灣成為反共基地，對於各項體育活動開始仍不注重，雖然1946年舉辦了第一屆省運，但是這些活動多半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不然就是呈現在一片反共復國的氣氛之中，運動對於政府而言，目的是要造就反共復國的人才，例如在1955年「公務員運動會」中，蔣中正先生在閉幕時致詞「務期人人都能參加運動，鍛鍊體魄，準備為國家作最大的貢獻 努力奮鬥，早日消滅朱毛匪禍，拯救大陸同胞，完成復國建國的艱鉅使命。」¹³⁹而同時期的民間棒球運動仍持續進行。棒球運動仍是台灣民間流行運動，但流行於國民黨政府與外省人間的運動，卻是以籃球為主，另外政府方面也無心、無力贊助這項台灣人喜好的運動，僅能針對幾個特殊案例加以輔助，例如鐵人楊傳廣、飛躍羚羊紀政，都是受到國家補助，直接在美國接受訓練，這也看出臺灣當時運動設備與教練人才的落後，好的選手必須出國受訓，他們後來果然替當時國際地位逐漸被中共取代的國民黨政府，增加了在國際間的知名度，也增強當時薄弱的民族自信心。於是當謝國城先生接手棒委會時，從想推廣棒球在國內的知名度開始，也讓國內球員和民眾瞭解外國選手的實力，進而希望有朝一日，國內棒球能揚名國際。

（三）蓬勃期至轉折期：

¹³⁹ 《台北新生報》，1955年9月11日。

就在自認為實力仍然不敵台灣棒球母國 - 日本的情形之下，來自台東的紅葉少棒隊，竟然達成成人棒球無法達到的事情，打倒了奪得世界少棒冠軍的日本和歌山隊，帶給國內無比的希望，於是謝國城先生等認為，要發展臺灣棒球，必須解決人才問題，因此向下紮根從少棒發展起，在沒有信心與國家經濟援助的情形下，取得了第一次冠軍，也受到國家注目，少棒代表隊出國政府相關機構出錢出力，出發前的授旗儀式，到了比賽獲勝之後的遊行與高官接見，都成了固定模式，而給予的關愛更是超越國外球隊，僅是父母親帶小孩參加夏令營的心態，球員們都戴上了「為國爭光」的帽子，這對於當時被迫退出聯合國（1971年）的國民黨政府，以及台灣人民而言，都是最大的鼓舞。但是幾乎年年奪冠使得台灣民眾對於這種「世界冠軍」的熱情逐漸消退，另外最主要的仍是成棒的表現仍是未達水準，無法在國際上站穩腳步，工商業對於政府鼓勵支援棒運給予減免稅收的作法，也不再產生強烈興趣，棒球少了工商業界的支援，政府又無力支援的情形下，只好呈現停滯狀態。

（四）目前：

在職業棒球成立，台灣棒球發展處於停滯狀態，雖然三級棒球持續有好的表現，但是成人棒球在甲組無法吸引觀眾，好球員又為外國球隊所吸收，國內一直無法營造出合適的環境引起民眾的注意，球員的未來更是茫然無所知，直到職棒成立，除了吸引民眾看球之外，許多球員雖然仍以加入國外球隊為第一選擇，但是若未有其他國外球隊的接洽，在甲組球員接受過國家培訓過程¹⁴⁰之後才能夠加入職棒，仍

¹⁴⁰ 入選進國家隊的球員必須經過國家培訓，也就是必須參與亞洲杯、洲際杯、世界盃、奧

然使得職棒人才，尤其在國內投手方面，更是難以補強，但是由於職棒有開放洋將的條款（兩聯盟均有，中華聯盟方面洋將人數依年度而有所不同），在國內投手缺少，以及強打型選手缺少的情形下，洋投、洋大砲（指打擊能力強）就成為各球隊競相爭取的對象，導致職棒成立之初，許多個人獎項，就落在這些洋將身上，台灣民眾雖然也逐漸習慣這種情形，但是仍然憂心本土球員實力提昇的問題，這時候大家關注的面向不再只是單純的「為國爭光」，而是配合棒球更加商業化，娛樂性、觀看球賽內容的細密度、球團經營以及未來球員動向 等等多樣性的想法、觀點，棒球除了是國球之外，更是在台灣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項休閒娛樂。

第三節 原住民在台灣棒球的地位：

在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由於他們強悍的個性，以及他們有別於日本人的文化，而在日治時期仍舊保有「出草」（獵人頭）的行為，在日本人眼中，他們相較於平地的台灣人，更難以治理，因此在初期武官總督來台時，就制定了理番政策，以武力壓制原住民，所以當能高棒球隊以全部為原住民（布農族）組成的球隊，發揮他們原始的爆發力，以及在原野生活中鍛鍊出的強健體格，經過調教之後，成為一支有正規的球隊，並且在台灣打完巡迴賽之後，更前往日本進行表演賽，而其中有幾名球員更為日本球探相中，而加入日本職棒，這對於台灣東區的棒球而言，給予東部有心打球的球員無比鼓勵，而對於日本人來說，能夠透過教化，使得他們心中野蠻的「番人」，在棒球運

運...等等賽事之後，加上年滿23歲才能加入職棒，這項規定為體總與教育部共同訂定，不同於美國與日本，球員只要高中畢業就能夠加入職業球隊。

動中，能夠表現得如他們正規的球隊一樣，動作一樣流暢，比賽過程中也表現出有禮貌的行為，如果不說出他們的身分，實在看不出有何差異，這對於日本人來說，看到自己教化出的成績，感到十分新鮮與欣慰。

二次世界大戰後，原住民球員在國家至上的情形下，身分到底為何已經不重要，例如曾在田徑場上創下奧運十項運動第一面銀牌的鐵人楊傳廣，他是一位阿美族的原住民，但是在1960年代，原住民身分是不被重視的，即使後來打敗日本和歌山少棒隊的紅葉少棒隊，當時也很少人知道他們是原住民（布農族），而後來台灣許多知名選手，都是原住民，如加入日本職棒的郭源治（阿美族），而後來職棒圈中的許多名將，如陽介仁（阿美族）、陳義信（阿美族）、鄭幸生（阿美族）等等球員，都是原住民，而他們在台灣棒球的發展史上，有著不可抹滅的地位。他們並不是台灣棒球發展的特例，而是原住民本身擁有不同於一般漢民族的天生爆發力，引用前文所提能高團紀實「他們身體的運動能力也是非常優秀，因為蕃人（原住民）從小的時候，就有為捕捉小鳥用投石頭來打鳥類的風俗習慣，因此他們投球的正確性是天生而來 加上他們跑壘速度相當地快 是內地人（日本人）選手所不及的 體力的強健對於打擊也是相當地有利。」¹⁴¹因此在台灣有許多運動項目的好手，也多是原住民選手，而要如何發掘原住民的潛能，使他們能夠有更好的空間，值得體育界好好思考。

¹⁴¹ 蔡宗信，〈日據時代臺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以1895（明治28）年至1926（大正15）年為中心〉，第四章第三節註27。

第六章 結語

2001年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在經過多年的爭取之後，終於取得了主辦世界盃棒球賽的機會。之前由於國內的場地、以及台灣在國際上地位的問題，使得總不在瑞士盧桑的國際棒球聯盟（IBAF）不敢也不願意讓我國主辦，而能夠主辦這場賽事，對於台灣而言，在職棒因為簽賭，兩個聯盟互相對力的狀況下，導致台灣棒壇消沈，而舉辦世界盃成棒賽正好給予國內棒球帶來一股熱潮，而國內觀眾在電視媒體大肆報導之下，漸漸也注意到這項比賽消息，在世界盃成棒賽舉行之前，國內更承辦了其他兩項賽事，一項為亞洲棒球錦標賽（成棒）、亞洲青棒錦標賽，國內的甲組成棒好手與青棒選手在這兩項賽事中奪得冠軍，使得國內民眾對於由職棒明星為主所組成的世界盃成棒代表隊，¹⁴²更是有十分的信心（先前由甲組球員組成的培訓隊，在國外的表現一直不好），希望能夠一舉獲得佳績，就連現任總統陳水扁先生也到場致詞，並宣示2001年為台灣棒球年。

雖然這項賽事確實使台灣棒球低靡的狀態重新復甦，但是並不表示台灣的體育環境有著長足的進步，以棒球運動為例，陳總統雖然稱它是台灣的「國球」，這意味著只是一項政治語言，確實台灣的棒球運動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台灣人民的真正參與，中間曾經一大段時期都成為民族主義的象徵，直到現在雖然民族主義的觀念削減，職業棒

¹⁴² 由於在1994年開始，由奧運會主席薩瑪蘭奇向國際棒球聯盟要求，希望開放職業選手參與各項賽事，以吸引更多觀眾對於棒球項目的重視，於是棒球聯盟開放1996年開放職業選手加入奧運。《台灣日報》，1994年2月1日。

球的成立，仍不能表示台灣棒球已經有著明顯的進步，這是非常容易證明的，相較於棒球發源地美國，以他們170多年的棒球歷史，加上120多年的職業棒球發展，棒球對於他們已經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將棒球術語融入在生活用語中，¹⁴³棒球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份，以目前美國職棒而言，加入大聯盟¹⁴⁴薪資高，合約更保障球員生活，而相較於同時期台灣職棒薪資約只有大聯盟球員的30分之1不及，¹⁴⁵這也是球員嚮往更高薪資的園地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畢竟台灣人口與經濟力相較於美國與日本仍是有一定的差距，美、日職棒人口多、市場大，而台灣人口與市場相較之下相差許多，球員薪資當然也有差異，球員水準也因此也有差異。但是台灣在體育發展上，由於長期工具性的使用，導致台灣體育教育從戰後一直處於不正常的發展，雖然體育政策一再修訂，卻只是停留在為國家服務的機制上，並非正常發展，直到解嚴之後，長期的惡質體育環境仍無法快速改善，民眾對於體育教育的觀念也無法一夕驟變，雖然政府相關單位已經朝正常化發展的方向努力，棒球發展也是如此，因此棒球仍無法成為台灣的「國球」，只能說是台灣人喜愛的運動項目之一，距離所謂的「國球」，似乎還有一段距離要走。

¹⁴³ David Plaut著，王希一譯，《棒球語錄》，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

¹⁴⁴ 美國職棒分有大聯盟與小聯盟，小聯盟表現好者有機會晉升大聯盟，加入大聯盟之後的合約與薪水方面幾乎是天價，根據中時電子報2002年12月19日，大聯盟2002年平均年薪為230萬美元（相當約台幣7500萬元），較去年上漲7%。資料來源：<http://news.chinatimes.com.tw/Chinatimes>。

¹⁴⁵ 2001年統一獅球員曹峻揚月薪為20萬元台幣。《大成報》，1998年12月28日。

參考書目：

中文：

1. 王惠民著，《紅葉的故事》，台北，民生報社，1994年。
2. 丘逢甲，《丘逢甲遺作》，台北，世界丘氏文獻社，1998年。
3. 史全生主編，《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江蘇，東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4.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5. 汪向榮，《中國的近代化與日本》，台北，百川書局，1988年。
6. 林國棟著，《我國體育外交之研究》，台北，文景出版社，1988年。
7. 派翠西亞 鶴見（E 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年。
8. 徐宗懋，《1950仲夏的馬場町》，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年。
9. 高正源著，《東昇的旭日》，台北，民生報社，1994年。
10. 張敬果等編，《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台北，九鼎出版社，1983年。
11. 許義雄等著，《中國近代體育思想》，台北，啟英文化出版社，1996年。
12.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
13. 新渡戶稻造著，吳容宸譯《武士道 - 影響日本最深的力量》，台北，先覺出版社，2003年。
14. 趙汝功編著，《體育概論》，台北，正中書局，1953年。
15. 樊正治，《中國體育思想導論》，台北，教育部體育司，1978年。

16. 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台北，師大書苑，1998年。
17. 賴樹明著，《台灣棒球曾紀恩》，臺北，知道出版社，1991年。
18. 謝仕淵、謝佳芬著，《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城邦文化出版社，2003年。
19. 瞿立鶴，《清末民初民族主義教育思潮》，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
20. 簡永昌著，《中華棒球史記》，台北，簡永昌發行，1993年。
21. 簡永昌著，《棒球與我》，台北，簡永昌發行，1977年。
22. 蘇錦章，《嘉義棒球史話》，台北，聯經出版社，1996年。
23. 《少年文摘 中華少年棒球隊專輯》，出版年、地不詳。
24. 《台灣省教育發展史料彙編（上）（下）》，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台中圖書館，1988年。
25. David Plaut著，王希一譯，《棒球語錄》，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

日文：

1. 功力靖雄，《明治野球史》，東京，逍遙書院，1969年。
2. 水野忠文《體育史概說 - 西洋 日本》，東京，杏林書院，1992年。
3.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2年。

學位論文：

1. 吳曉雯，影響職棒球迷選擇支持球隊的因素及其與忠誠度、滿意度的關係，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2. 林瑞泰，美國日本台灣職業棒球契約規範之研究，國立體育學院

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6月。

3. 高英傑， 棒球 ， 國立體育學院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4. 高興桂， 我國職棒球隊企業經營困境因素與解決策略之研究 ， 國立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5. 張力可， 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6. 梁淑玲， 社會發展、權力與運動文化的形構 - 台灣棒球的社會、歷史、文化分析(1895-1990)，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7. 曾瑞成， 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研究 (1949-1997)，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文，1999年。
8. 黃正安， 日治時期臺灣的廣播體操推展情形之研究 ，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9. 楊清瓏， 棒球 (攻擊)， 國立體育學院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10. 楊賢銘， 棒球 ， 國立體育學院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11. 葉志仙， 棒球運動防守技術與戰術 ， 國立體育學院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12. 樊中原， 抗戰時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大專院校活動之研究 ， 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13. 蔡宗信， 日據時代台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 - 以1895年 (明治28年) 至1926年 (大正15年) 為中心 ， 國立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期刊論文：

1. 王復旦，從金龍少年棒球隊成功說起：談中國全民體育治本之道，《國民體育季刊》第1卷3期，1969年12月，頁3-5。
2. 林千源，談台灣職業棒球隊之經營策略 - 以兄弟象隊為例，《中華體育》第8卷3期 = 31，1994年12月，頁48-54。
3. 社評 今後之國民體育問題，《大公報》第一張第二版，天津大公報社，1932年8月7日。
4. 近代中國季刊編輯委員會，史料選輯，《近代中國》第5期，1978，頁94。
5. 段嘉蓀，誰是王牌 - 記錄與棒球史的書寫，《中國論壇》第32卷12期 = 384，1992年9月，頁42-44。
6. 范源濂，今日世界大戰中之我國教育，《中華教育界》第23期，1914年。
7. 翁嘉銘，棒球的美麗與哀愁 - 民心變遷下的台灣棒球史，《中國論壇》第32卷12期 = 384，1992年9月，頁27-31。
8. 高正源，原住民與台灣棒運（下），《山海文化雙月刊》10期，1995年5月，頁32-36。
9. 高正源，原住民與台灣棒運（上），《山海文化雙月刊》9期，1995年3月，頁32-36。
10. 教育部主編，《第一次中國教育評鑑（丙編）》「教育概況第六社會教育概況」，1933年。
11. 梁啟超，新民說 尚武論，《新民叢報》第28號，1902年。
12. 郭成，發展自己的職業棒球隊，《自由青年》第73卷1期 = 665，1985年1月，頁32-34。
13. 陳獨秀，青年體育問題，《新青年》第7卷第3期，1920年，頁319。
14. 游至樞，棒球運動簡史，《體育學報》10期，1987年6月，頁332-336。

15. 黃玉峰， 將棒球史實塞悠悠之口 ，《新聞天地》1337期，1973年9月，頁17-18。
16. 楊武勳， 人才外流？人才外銷？ - 從棒球好手紛紛赴日談發展棒運 ，《聯合月刊》42期，1985年1月，頁56-59。
17. 楊照， 抽離了民族主義之後 ，《中國論壇》第32卷12期 = 384，1992年9月，頁37-40。
18. 詹德基， 我國棒球運動的發微與展望 ，《教育資料集刊》10期，1985年6月，頁433-483。
19. 蔡宗信， 日據時期台灣東部原住民棒球運動之發展 ，《山海文化雙月刊》9期，1995年3月，頁37-43。
20. 瞿海良， 台灣原住民的九千分、雙一百 ，《山海文化雙月刊》9期，1995年3月，頁1-4。
21. 瞿海良， 台灣原住民棒球傳奇 ，《山海文化雙月刊》9期，1995年3月，頁25-31。
22. 瞿海良， 台灣原住民棒球傳奇 - 久違了！能高兵團 ，《山海文化雙月刊》9期，1995年3月，頁8-20。
23. 譚瀛州， 我國基礎棒球運動的檢討 ，《大學雜誌》85期，1975年5月，頁20-26。
24. 《自由中國之工業》，第23卷第4期，1969年10月，頁30-31。

報章資料：

1. 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庫 1930年~2001年。
2. 《台灣日日新報》，1924年（大正13年）9月18日。
3. 《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昭和6年）8月31日。